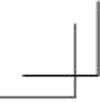


春 人
秋 物







军旅名将董占林

刘文江*

厚重的拒马河文化养育了拒马河儿女。风光秀丽的拒马河畔，走出了百战将军、军旅名将、传奇将军董占林。

董占林，男，汉族，籍贯为北京市房山区镇江营。1923年11月生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38年参加八路军，成功走出了一条从士兵到将军的传奇人生之路。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成为拒马河畔、房山儿女的骄傲。

从小长工到八路军战士

董占林祖籍在河北省涞水县西水北村，1935年，定居在房山县镇江营村。父亲董伯兴1904年考取秀才，清政府取消科考，父亲在张坊开办私塾。后带着母亲迁到涞水县的宋各庄。1923年11月8日，董振林在宋各庄出生。1927年董伯兴带全

* 刘文江：原区史志办主任



家到沈家庵村教私塾，1929年带全家到房山县张房镇教私塾。1930年开始跟父亲读私塾。1932年闹饥荒，父母将三弟卖给人家做养子。1933年，父亲给人打工。1934年，贫病交加的父亲染病身亡，1935年，生身母亲染病离世，留下11岁的董占林和不满9岁的弟弟两个孤儿。从那时开始，弟弟给人家放牛，董占林成为地主家的一名小长工。

董占林在回忆录中写道：“长工在地主富农眼里不是人，只是一架干活的机器，没有起码的自由和人格。给东家干活不但又忙又累，还得加倍小心，要不注意撒了一点东西，或者打了一个碗，东家就劈头盖脸的猛打我。他打我，我是一声不吭，从来不哭，也不哀求他饶恕我，眼泪从不流给他看……”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进攻华北，9月，良乡县城、房山县城、涿县县城、涞水县城先后陷落，国民党地方政权人间蒸发，地方武装蜂拥而去，占山为王……国已不国，老百姓陷入苦难的深渊。

1937年10月27日，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立4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所率部队为115师独立团。1937年底，以独立团的十多个连队为基础，扩编为三个团，称一、二、三团。一团团长陈正湘。

1938年农历二月底，团长陈正湘带领一团一营转战到了石亭、虎过庄和张坊一带，董占林与一营四连相识。

这支部队，与土匪武装不同，与国民党中央军不同，队伍



整齐，步伐一致，很威风。特别是他们一进村子，就拿起扫除，帮老百姓打扫院子打扫街道，还给老百姓挑水。安顿好之后，就坐在一起，听一个当官的讲话。那当官儿的讲话，和和气气，听起来亲切，没有一点国民党军官的架子。当官的讲完话，大家便一起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这支部队引起了董占林的极大兴趣，他开始偷偷的观察这支部队。

每当开饭时，士兵们都拿着碗，站好队，集体开饭。开饭前总要先唱歌，歌声响亮，非常有精神。然后才有秩序的开饭。全班围一堆吃饭。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吵闹，和国民党的中央军，有着很大的区别。

董占林愈加喜欢这支部队。

一天，董振林跟在司务长后面，看他从各家各户买鸡蛋。一大筐鸡蛋，很不好提，董占林主动上前帮他拿，司务长见董占林很机灵，很喜欢这个小孩。但董占林趁机问他：“我要当兵，你们要不要？”司务长一愣，然后说：“你要当兵，我们欢迎。”董振林非常高兴。第二天，他又去找司务长，司务长告诉他：“我们同意你到部队来当兵”。从此，小长工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董占林领到了一条旧军裤和一条绑腿，跟着陈正湘的一团走上了抗日战场，开始了革命生涯。

征战华北抗日战场

董占林到四连连部担任了通讯员。



初到部队，一切都让董占林感到新鲜。他上进好学，凡是不明白的，都向同志们请教。他向文书请教：为什么连长指导员一说：“同志们”，大伙儿都马上立正。文书告诉他，什么是同志，什么是同志们。董占林进步非常快。他甚至找到支部书记，给指导员提意见。指导员一方面向他道歉，另一方面又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小战士。

几次战斗，董占林没有到战斗第一线，他有些不满意了，当兵就是打鬼子，替死难的老百姓报仇。他要求到战斗班当战士。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董占林成为四连八班的一名战斗员。

1938 年秋，日军组织 5 万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进行围剿。为了粉碎日军的围剿，1938 年 9 月下旬，董占林所在的一团对邢台县王快镇两个大队的日伪军发起进攻。战斗在上午 7 点钟打响，四连遭到日寇顽强抵抗。一、二排长相继牺牲，董占林所在班虽只剩下 6 个人，仍在顽强战斗。下午 5 点，在向前搜索时，高粱地里突然跳出五六个鬼子，八路军战士来不及瞄准射击，便和鬼子展开了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由于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大，有 3 个同志倒在血泊中。只有 15 岁的董占林，左手食指被敌人的刺刀刺伤，鲜血直流，仍然坚决和鬼子血战，在战友的策应下，把刺刀捅进了一个鬼子的胸膛。血战的关键时刻，排里其他同志赶到，把剩下的几个鬼子全部消灭。

董占林的手指负伤后，伤口感染，胳膊肿得像碗口一般粗，卫生员叫来担架，要把他抬到老乡家养伤，他坚决不肯。因伤



口感染发着高烧，跟不上队伍，连里用担架抬着他，转战 11 天。董占林深深地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同志与同志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1939 年 11 月，董占林在一分区参加了 4 个月的测绘训练学习，成绩优秀。1943 年 2 月，晋察冀军区组织 160 人的干部队到冀东工作。董占林踏上进军冀东的路途。他与干部队战友一起，行军 90 天，行程 3000 余里，穿越平西、平北两个军分区，胜利到达冀东军分区，成为侦察参谋。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董占林等 8 位同志与大部队失去联系。8 位同志有三位没有摸过枪，而且只有董占林一个上过战场，打过仗。他们躲过敌人的拉网式搜索，和老百姓一起藏在石板山，日军白天上山搜剿，晚上点起篝火监视。大家说好，到了最后关头，就跟鬼子拼了，决不做俘虏。最危险的一次，鬼子的刺刀就戳到距他们几米远的草丛中。几经周折，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大部队会合。董占林先后担任冀热辽军区第 16 军分区侦察参谋兼侦察连长，一直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活动。

1944 年 9 月，董占林带领 7 名侦查员，由抚宁县到达北戴河北部石炭庄，决定智取铁庄据点。29 日利用伪军副班长去秦皇岛办喜事的时机，攻克铁庄据点，缴获 2 挺机枪、2 具掷弹筒、7 支步枪、2 箱炮弹和子弹。团长曾克林给予通令嘉奖，政治处奖励 200 元钱。董占林 100 元交党费，100 元给侦察连改善伙食。

董占林作战指挥才能在战争中迅速提高。



激战东北战场

1945年8月13日,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接到中央命令,率部4000余人从抚宁县向沈阳进发。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并没有最后放下武器。曾克林率部绕开山海关、秦皇岛等日寇盘踞的重镇,快速向关外挺进,根据敌情,决定攻打前所车站。董占林奉命带领8名侦查兵前往侦察。董占林才了解到日军已经撤回山海关,前所车站只剩下400多个伪军,正要逃回山海关。

必须尽快把敌人一网打尽。董占林决定以八路军某部队长的名义,给伪军发出通牒:你们已被八路军团团包围了,如在下午5时前不投降,将被八路军坚决消灭。伪军不了解虚实,5时整,400多名伪军向董占林投降。来到伪军指挥部,董占林看到还挂着日本旗,拔出驳壳枪冲着旗子就是3枪,打下日本军旗,顺利占领车站。“你为咱们挺进东北第一个作出了贡献。”看着满仓库战利品,司令员曾克林随手挑了一条日本军用皮带,作为给董占林记大功的奖励。曾克林率部回师,一举攻克7000日伪军守护的山海关,牢牢卡住了国民党军队出关的咽喉。

由于电台功率小,出关后不久,曾克林就与总部失去了联系。中央“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决策已经成型。曾克林并不知情。攻克山海关后,董占林跟随曾克林一路势如破竹,



于9月5日到达沈阳，孤军深入东北腹地400公里。9月14日，曾克林乘坐苏联的飞机赶赴延安，向党中央直接汇报进驻东北的详细情况，中央迅速制定了新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有专家称：他们无意中改变了中央的战略，东北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掌握了东北，就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9月3日，董占林带部队光复兴城后，兴城6000老百姓报名参军，吸收3000人建立补充第一团，22岁的董占林走上团长岗位。

1945年10月，国民党第13军、第52军乘美国第七舰队在秦皇岛登陆，杜聿明率重兵攻打营口、山海关。董占林的补充第一团编为东北人民民主联军第22旅65团，进驻大凌河海岸准备阻击国民党军队。11月16日，补充第一团奉命火速回锦州，20日，与延安警卫一旅二团（朱德警卫团）合编。22日乘火车奔赴锦西，据守塔山与兴城阻击敌人。国民党军依据密集炮火，狂轰滥炸65团阵地。65团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次冲锋。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击毙敌人800余人，65团伤亡500余人。英雄的兴城子弟兵给董占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6年2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94军入关，与敌第13军企图攻占赤峰、承德。1946年5月，冀察热辽军区决定发起古山战役。董占林时任辽西纵队16旅第48团副团长。5月5日纵队首长指令董占林率领48团一个营，于5月12日夜攻占黑水，5月14日拂晓，占领建平县，在建平与老



虎山之间，选择有利地形阻击潮阳河可能向古山增援之敌，保证古山战役的胜利。

黑水镇是古山敌军第 162 团的外围据点，驻有 300 多骑兵，西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守敌火力较强。敌第 162 团主力驻在古山。董占林决定，夜袭古山。董占林带领部队隐蔽行军一昼夜，5 月 12 日下午，隐蔽在黑水 130 里处。夜里 11 点，接近敌人阵地，趁其不备，向敌人发起猛攻。5 月 13 日凌晨结束战斗，打死打伤敌人 30 多人，俘虏 200 多人，缴获 300 多匹战马和大量军用物资。部队连续作战，5 月 14 日三时，又进到建平县西北隐蔽。随即实施强攻，迅速攻下建平县城。于 5 月 15 日黄昏前，占领老虎山附近的有利地形，阻击可能从朝阳出来增援古山的敌人。

16 旅政委对董占林给予了高度赞扬。

1947 年初夏，东北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48 团参加了攻坚隆化、围场之敌战役。国民党 13 军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占据泰山、棋盘山、隆化中学等战役要点。48 团主攻泰山。敌军依靠重炮和飞机掩护，火力凶猛，敌我反复争夺半个多月，重创隆化守敌。

6 月 20 日，以 16 旅为主，发起围攻凌源战斗。董占林率领一营于下午 9 时赶到凌源城南，立刻冒雨观察地形，选择攻城突破口。南大河绕过城南，凌源城易守难攻。晚 10 点，部队发起攻击。我军迅速攻入城内，占领三个院落和一个高地，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战斗持续到 21 日凌晨三点左



右，进入僵持状态。董占林迅速调整部署，快速攻入城中，与敌军展开巷战。激战到上午 11 时，夺取凌源县城。

1947 年 7 月，16 旅改为八纵队第 23 师，48 团改为 23 师 69 团。1947 年 9 月，东北野战军发起秋季攻势。

7 月 15 日，69 团奉命迂回杨杖子东南一举攻占莲花山。杨杖子敌 22 师深感不妙，立即组织攻打莲花山。69 团连续打退敌人 5 次冲锋，丢下 400 多具尸体。16 日下午 2 点，23 师与独一师对敌发起总攻，毙敌 1000 余名，俘虏敌副师长以下 2500 余人。20 日，敌 49 军 2 个师再次占据杨杖子。21 日 1 时，冀热辽军区电令 8 纵歼灭该敌。

21 日 2 时，69 团乘夜攻打三二三高地。11 时，两个连向高地发起进攻。由于我军的支援火炮太少，炮弹不足，敌人从三面向我反扑。战斗进行到下午 5 时，仍未占领主峰。69 团调整作战方案，决定夜袭三二三高地。晚上 9 时接近高地，11 时发起攻击，11 点半占领高地。敌军组织一个加强营，对高地进行疯狂反扑，69 团顽强的守住了高地。战役结束后，纵队党委授予 69 团五连连长“毛泽东奖章”一枚，授予五连“刺刀见红”锦旗一面，并嘉奖 69 团。

1948 年 7 月，董占林升任 69 团团长。

锦州是连接东北与华北战场的战略要地。攻占锦州，首先要扫清锦州外围之敌。9 月 23 日，69 团奉命到石佛铺集结，9 月 24 日受命于 25 日在锦州以北薛家屯将敌 22 师第三团包围，69 团夜渡大凌河，24 日夜包围了薛家屯之敌。25 日上午 10 时，



敌军连续向我阵地进攻，企图夺路突围，战斗非常激烈。敌军派出飞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69 团连续击退了敌人七八次冲击。我军占领了薛家屯，切断了锦州，与义县之敌的联系。

董占林率领 69 团，为夺取锦州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

鏖战辽沈平津战役

1948 年 9 月 12 日，辽沈战役开始。

1948 年 9 月 25 日，锦州战役开始。69 团于 10 月 3 日受命于 10 月 4 日凌晨攻占大紫金山。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胜利攻占大紫荆山主峰。10 月 5 日夜，奉命攻打锦州北面近郊据点姚屯。胜利攻克姚屯。10 月 8 日，69 团奉命开进东白沟河一线，阻止从锦州出来的增援小紫荆山之敌，定于 10 月 10 日夜里 12 时前，攻占小紫金山西侧的洋灰炮垒。战斗打响后，我军用爆破筒引爆地雷区，11 时候，攻占了炮垒。10 月 14 日 11 时 40 分，我军向锦州发起总攻。69 团担任 23 师纵深战斗第一梯队。下午 5 时，部队进入突破口，敌人组织疯狂反击，董占林指挥战士消灭了突破口两侧敌人的火力点，迅速向城内挺进。夜里 9 时，69 团主力攻占敌 54 师师部。战斗持续到 15 日下午 3 时。69 团歼敌约 2600 余人。全团伤亡 1350 多人。

1948 年 10 月，69 团参加了歼灭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25 日凌晨三时，部队出发，急行军五个多小时，到达西赵家窝堡。上午 10 点，奉命立即投入六间房战斗。69 团与 60 团并肩抗击



敌人进攻。晚十点，部队急速转移，于拂晓前到达饶洋河边。部队迅速渡河，中午时分到达兴隆岗子。午夜时分，部队立即沿饶阳河东岸向北疾进，阻击向沈阳回撤之敌。黎明时分，师部骑兵通讯员传达师部命令：全团加速前进，哪里有敌人，哪里有枪声，就哪里前进。部队直向康家屯方向奔去。敌人黑压压一片，潮水般由西向东卷来。董占林命令部队火速占领前方的康家屯，顿时枪声大作。董占林上房观察敌情。方圆十几里，后荒岗子、郑家窝堡、康家屯三个村子鼎足而立。数倍的敌人蜂拥而至，情况十分危急。董占林命令山炮连和各连机枪一起向敌人发射，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势头。董占林又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向敌人发起反击。闻听冲锋号，一度失去联系的三营，从郑家窝堡方向敌军发起攻击，全团上下全部投入战斗。10月27日上午9时许，敌新六军22师64团全部、65团与66团一部分被董占林69团歼灭。毙敌300余人，俘敌2400余人。22师号称蒋介石东北部队的“旗杆”，敌64团被称为“老虎团”，是廖耀湘的先头团。上午10时，敌65团与66团又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康家屯阵地猛攻。进攻一次比一次激烈，12时，坚守康家屯的一营告急，董占林命令预备队五连出击，迅速稳住了防卫态势。黄昏时打退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跟在22师后面到廖耀湘，只好掉头向敌40军方面逃窜。

此战，69团歼灭敌精锐部队3100多人，全团伤亡500多人。战后受到纵队领导表扬。

1948年11月1日，第八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



69 团改称 134 师 402 团。董占林继续担任团长。

11 月 25 日,402 团随 45 军向华北开进,参加平津战役。1948 年 12 月 16 日,经过连续 22 天急行军,隐蔽行进 1500 多华里,到达天津宝坻地区。12 月 22 日深夜 12 时,董占林率领 402 团到达崔家塘头构筑工事。1949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中午 12 时 4 分,135 师突破民权门,402 团进入突破口,向市区挺进,歼灭 22 号桥一带的敌人。守在长江造纸厂的敌人,凭借顽固的攻势,挡住了我军的进攻。402 团的行动,被耽误了两个小时。全团兵分三路,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街垒攻坚战。15 日清晨,攻克中山公园。全团连续作战一天一夜。战斗持续到 15 日下午,天津守敌全部被歼。402 团伤亡 300 余人,歼敌 2000 余人。

董占林率部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南下湘潭广西

1949 年 4 月 10 日,董占林率 45 军 134 师 400 团,从天津杨柳青随大军南下湘潭,部队日夜兼程,行程 1500 公里。

1949 年 10 月 1 日,400 团参加衡宝战役,按时到达杨家桥地区。3 日,尾随溜走敌人,沿着山路,向南一路挺进。10 月 7 日,到达金兰寺。10 月 9 日,到达 1000 多米高的赤壁岭。10 日上午 11 时到达严家庙,攻打白崇禧的王牌师 176 师。董占林带领部队迅速占领人家庙西北侧的大山,居高临下向敌人



进攻，连续攻占敌人占领的六七个山头，但 8 连在进攻尖山子山头时，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董占林决定，采取小群多路突击战术，三个阵地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八连连长大声喊道：“共产党员们，跟着我冲上去”。第二天清晨，战斗胜利结束。134 师歼敌 5300 余人。

1950 年初，400 团进驻西南边防泸州地区的水口关、平而关、镇南关、隘店关一线，执行保卫国防、清剿残匪的任务。1950 年 1 月 9 日，国民党残敌近万人，由靖西之平孟窜入越南边境，企图占据高平以北的地盘，保存实力，但未能立足，便从越南蹿回水口关，准备进入越南东北，从海上逃往海南岛或台湾。上级要求 400 团阻击敌人，诱敌深入，将其消灭在中国境内。董占林迅速在 300 公里边防线上收拢部队。2 月 1 日早晨，敌人乘我边防守备力量不足，便一涌而入，于当日下午 3 点进至水口关。四连一排发现敌人后，迅速占领了南侧的古代要塞炮台山，孤军作战，与进犯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三四次进攻，打死打伤敌军 30 余人，并派人将敌情向团部报告。那时从龙州到边防务关口的部队，不但没有无线电台，有线电话也不通。当日下午，董占林接报告后，立即从龙州出发增援四连一排。但不知道一排由于寡不敌众，已在黄昏时主动放弃水口关，先撤到越南境内，再绕道撤回国内。

2 月 4 日拂晓，敌军由水口关向东开始蠕动。10 时许，敌军行至大青山以西地区。董占林预先埋伏好部队，阻击敌军。敌对我军兵力不明，不敢恋战，只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我军对峙，



大部敌人则绕道沿国境线向平而关方向窜犯。400 团九连为阻击敌人窜出国境线，仅以 40 分钟的时间，便抢占了大青山，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侧击敌军。董占林指挥全团在大青山麓与敌终日激战，杀伤敌人 100 余人，为全歼敌人争取了时间。董占林率领团主力，于 2 月 4 日夜间继续尾追敌人进到橄门山区，但摸了几个山头，没有发现敌人。部队昼夜兼程，已 5 夜没有休息，两天没有吃过一顿热饭，但大家仍然咬紧牙关，坚持战斗，没有一个战士掉队。

董占林在二连攻占的修龙岭阵地，看到敌人乱了营，但重机枪射手还瞄准射击，急得他大声喊道：“敌人都乱了，还瞄什么？到处都是敌人，快打！”随后董占林躺在地上用脚蹬住重机枪扳机，一气就把 250 发子弹射向了敌群。董占林带领部队与兄弟部队，一起连续作战，经过 7 天 6 夜的激战，2 月 7 日上午战斗结束，共歼灭国民党残敌约 8000 余人。

广西是桂系军阀的老巢。灵山县盘古村的土匪，凭着山高林密，易守难攻负隅顽抗。广西军区的部队前来进剿过两次，都未能歼灭。1950 年 9 月 1 日晚，董占林率部攻打盘古村土匪，情况不明决定暂时不。9 月 20 日，董占林率部第二次攻打盘古村土匪。敌指挥部固守着一个高墙碉堡，有 1 挺机关炮、轻重机枪，火力很猛。三营反复冲杀 5 次，未能拿下敌人的碉堡，形势十分严峻。六连组织了十名勇士组先后牺牲。副班长徐汉林将手榴弹塞进炸药包，炸开了碉堡。徐汉林壮烈牺牲。经过打扫战场，匪政治部主任陆益生、匪团长黄硕德等 70 多名顽



匪被击毙，300 多名匪徒被俘。

在指挥部队完成了广西剿匪的艰巨任务后，董占林又挥师转到广东省清远县，担负机动作战，保卫祖国南大门的光荣任务。

参加上甘岭战斗

1951 年 10 月，董占林由 404 团团长调任 54 军教导大队大队长。

为了给即将入朝作战的各部队摸索经验，中南军区派出 16 名同志先期赴朝，董占林也在其列，担任第 87 团见习团长。从广东出发，行程 3000 多公里，抵达安东，在安东等了七八天车，才乘夜跨过鸭绿江，直奔上甘岭前线。

一天晚上，董占林所乘车队翻越高山时，敌人空袭特别激烈。他们刚到山口，敌机突然来袭，照明弹悬在空中，把车队暴露在光照之下。他们迅速跳下车，隐蔽到路旁树林里，只见敌机反复俯冲，炸弹连续爆炸，汽车被炸中起火，有的同志倒在血泊里，有的负了伤，但敌机一飞走，车队又顽强地继续行进了。经几天急行军，赶到 87 团二营所坚守的王在峰、发利峰阵地。

这个阵地，与敌人只隔一条大沟，相距约 400 米左右，最近的只有 100 多米。。在前沿阵地上，部队正贯彻志愿军总部关于“积极防御，消灭与消耗敌人，保持与提高自己”的战术



思想。

当时董占林在 87 团（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邱少云烈士生前所在的团）当见习团长。在开展小部队歼敌运动中，董占林参与制定了为保障该团与某军的结合部安全，改善我军防御阵地态势的“三九一高地”潜伏反击作战计划：即在前沿阵地秘密潜伏，然后出其不意，迅速攻占该高地。该团按照这一作战方案，精心组织，大胆潜伏，只进行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就一举攻占“三九一高地”，全歼守敌 150 多名。他们的做法得到了充分肯定和推广。这次战斗，涌现出了不惜烈火烧身、宁死遵守潜伏纪律，荣获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及朝鲜金日成奖章、一级国旗勋章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邱少云的典型。

1952 年 8 月，董占林与中南军区到朝鲜见学的全体同志，返回祖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 年 12 月 24 日，从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回到了 1952 年 12 月就已经入朝作战的 54 军工作，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担负着守卫“三八线”和东、西海岸线的战备任务。1957 年 2 月，董占林被任命为 54 军 130 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该师在朝鲜 5 年半，除参加著名的金城反击战外，还担负着海防前沿和沿海岛屿的守备任务，战绩辉煌。战后的朝鲜，到处可见战争的严重创伤，董振林与官兵一起，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全力投入，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斗争。在肩并肩的生产建设中，与朝鲜人民同甘共苦，建设家园，结成了崇高的国际主义友谊。



1958年2月19日,为打开美国所造成的朝鲜问题僵局,促进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于1958年底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师长董占林奉命率130师于7月11日从朝鲜回国。

董占林和他的战友,勇敢捍卫了国际和平。

挥师西藏平叛

1959年3月20日,拉萨叛乱。董占林率130师于1959年3月25日出发,翻过二郎山,跨过泸定桥,翻越雀儿山,于3月29日到达昌都地区平叛。昌都共有12个县,叛匪以齐美公布为首,约有3000多人。根据敌情,董占林实行多路多面的合击策略。388团于4月21日合围德登寺,扑了空。5月6日,389团获悉,参加叛乱的藏军第33代本然日德郎率50多名骨干龟缩于金沙江西南岸的仙人洞内,该团立即集中兵力围歼仙人洞。7日下午3时,对仙人洞守敌多次发起攻击,均未奏效。8日下午6时35分,击毙匪首本然日德郎,其余匪众出洞投降。390团奔袭学拉山、张朵山,也歼灭一股叛匪。

董占林带领部队进藏后,由于连续战斗,加上气候不适,得了一场重病,发高烧达40度。患病期间,始终不下火线,带病指挥战斗。

昌都地区大部分匪徒被消灭后,剩下的残匪便都龟缩到穿甲寺,并纠集附近8个寺庙的喇嘛叛匪五六百人,裹胁群众



2000 多人，在豆扎地区与我部队周旋。后再航空兵支援，围攻穿甲寺结束。

紧接着董占林又带领部队，乘胜转战昌都东南地区，消灭了以俄马日郎、陈林、尹登扎巴为头目的数千人组成的匪帮。昌西叛匪约 2000 多人，是由国外空投的小炮、机枪等武器和电台装备起来的一股叛匪，反动气焰甚为嚣张。董占林所率的部队在友军 126 团、156 团、昌普教导营及成都军区的三团、四团密切配合下，乘胜追击，穷追猛打，很快歼灭昌西地区叛匪。

1960年冬，西藏地区大部分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基本平息，但昌都地区宁静县老然寺活佛扎巴·麦本巴所率的宁静残匪骨干，仍然活动于金沙江以西的川藏交界处一带。1961年4月1日，董占林统一指挥 388 团、成都军区三团、昆明军区 26 团三营共 6 个营的兵力，奔赴宁静三岩地区重点搜剿扎巴·麦本巴这股顽匪。经过 10 多天的控制，范围越来越缩小。扎巴顽固逃窜到深山的一个石窟里，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5月18日上午9时，388 团张志信团长身先士卒，冲到距敌 50 米处指挥战斗。匪首扎巴喇嘛·麦本巴等当场被击毙，6 名空降特务吞毒药自杀，当场有 5 人丧命。1961 年 9 月 17 日，董占林完成了宁静地区的清剿任务后，回到昌都师指挥部，全师出色地完成了西藏平叛任务。1961 年 12 月 31 日，他率全师部队告别了艰苦战斗生活 3 年的昌都地区西藏人民，凯旋回到四川省雅安地区。

董占林带领部队，保卫了西藏人民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英勇反击印军

1962年10月10日，董占林接到了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的作战命令。军区首长反复强调：此次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只准打好，不准打坏。当时，部队正分散在100公里范围内开荒生产。董占林采取边集结、边动员、边补充、边调整、边组织的办法，48小时内将部队全部集中。只用了一周时间，就从思想动员，武器装备、作战物资、生活给养等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10月20日乘车开赴西藏。

董占林率领部队沿着川藏公路，昼夜兼程向喜马拉雅山麓急进，赶到瓦弄地区。瓦弄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南麓，“麦克马洪线”以南。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国土。当时驻瓦弄地区的印军第十一旅，下辖4个步兵营、2个七五榴弹炮连、2个一〇七重迫击炮连以及工兵勤务分队，共2000多人，是印军第四师“王牌军”，也是印军首脑梅农、考尔起家部队之一，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较强的战斗力。据说4个营中有3个营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部分军官和30%的士兵曾在欧洲、非洲和东南亚与德、日军作过战。印军在瓦弄地区于1942年设防，盘踞此地已有20多年，对地形道路和自然条件较熟悉。

董占林多次深入前沿阵地察看，分析敌情，认为瓦弄地区的山势、地形，归纳起来有12个字：山高、谷深、坡陡、林密、



路险，水急。一般的山都有 1500 米左右，最高 4000 多米，山顶直耸云天，白雪覆盖，终年不化。沿最高的山峰 05 号高地，是重要的战略之地，占领它是决定这次战斗取得胜利与否的主要行动。

10 月 5 日，部队连夜摸到 05 号高地，并紧急修筑工事设防。11 月 13 日，敌人发现我抢占 05 号高地，十分恐慌。他们一面加强 07 高地至 39 高地的防御，一面向我 05 号高地的部队攻击。敌人的攻击很快被我军挫败。11 月 13 早晨，07 号高地的敌人开始向我 05 号高地反扑，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四连战士打退，四连指导员余阳春在此期间，率领 23 名突击队员，向 06 至 07 号之间的无名高地出击，在火箭筒的掩护下，经过 3 个小时的英勇奋战，毙敌 67 人。11 月 15 日夜 11 时左右，我 388 团正向 05 号高地运动时，被敌人 5 挺重机枪封锁。董占林指挥 388 团用 5 门八二迫击炮压制敌人的火力，一连发射了 900 余发炮弹，压住了山沟里敌人的重迫击炮的火力，为进攻部队扫平道路。16 日凌晨，董占林指挥 390 团三营向 07 号高地之敌开始进攻。07 号高地是敌防御纵深侧翼的制高点，约有 400 多人，我部以强大的攻势，猛、准、狠地捣毁这个据点，歼灭中校营长以下 62 人，捣毁 3 个营部，其余残部拼命逃窜。

担负歼灭河东守敌任务的 289 团一、三营，主攻 80 号高地。经过 4 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歼灭了 80 号高地守敌。390 团主力于早上 8 时开始，攻击 31 号和 32 号高地守敌。我军组织爆破组，炸毁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碉堡，6 时 40 分，390 团首先



攻进瓦弄，把红旗插上了原印军十一旅部的房顶，被印军侵占的瓦弄地区，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6日下午4时，敌军认为大势已去，下令全军撤退。

11月17日下午，部队投入搜剿残敌的战斗。389团一连连续作战22天，翻越6座3500米以上的大山，4次断粮，仍然保证完成任务。印军16个步兵连，15个全部被歼，打掉的印军第11旅的老底子。11月22日，我军主动停火。12月1日，部队撤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

董占林带领指战员，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军威。

1966年，董占林担任了陆军第54军副军长。1970年任陆军第11军军长。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事件影响，一度曾待分配工作。董占林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批示恢复董占林的工作。1979年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陆军第47军军长。1980年12月至1990年4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常务委员。1982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2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委员。董占林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多次获得部队的嘉奖和勋章。在抗日战争中，1944年铁庄战斗中受冀东12团通令嘉奖一次，1945年春在冀东抚宁县张奄子战斗中受冀东16军分区通令嘉奖一次，1945年8月收



复山海关以东前所站敌军据点中，受 16 军分区通令嘉奖一次。

董占林先后获得过二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勋章、独立军勋章各一枚，还获得过 7 个纪念章：解放东北纪念章、解放华北纪念章、解放中南纪念章，解放全国纪念章，朝鲜政府授予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云南老山前线作战纪念章。



抗日楷模——姜振政

陈广祥*

(一)

姜振政，字号实泽，曾用名姜时喆，江石之，这都是做地下党工作时，曾用过的名子。佛子庄村地处大石河北岸，元代就已成村。这里地势奇峻，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村口原有瓮门，上有佛龛，内供泥塑佛爷像，村名原为佛爷庄，后演变为佛子庄。1908年10月的一天，姜振政就出生在这个村，姜氏家族在村为大家族，而姜家虽然不是什么豪门，在村里也是出类拔萃的，名声在外的家庭。姜振政幼年时期，受其父母言传身教，而且知书达礼，是一位有革命理想的进步青年。早在民国16年间，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山区进行经济封锁，使山区百姓已有一年买不到食盐吃，只能靠咸菜当盐用，可国民党当局还要进山查盐，姜振政对此产生极大的愤恨。

初春的一天，村民们得知国民党派地方武装，大约一个排的兵力，为首的是个排长，来佛子庄为了查盐。那排长歪扛着

* 陈广祥：新华人寿保险公司退休职工



帽子，带着三十几个国民党士兵，顺着河套沟，耀武扬威走着，刚到黑龙关时，被佛子庄民兵哨卡发现，并迅速报告村里。姜振政带领民兵，准备给查盐者一点颜色看看，民兵隐蔽在娘娘庙周围，等着那群查盐的士兵。当士兵刚一进村，为首的那个排长，便问路边拾粪的老头：“哪里藏盐”？那个老头随口便说：“娘娘庙藏有食盐”，这些士兵信以为真，便背上枪快步奔了庙。刚一进娘娘庙，庙里的道士敲响了铜钟并高喊：“匪徒进庙闹事”，姜振政听候一声令下：“给我打”！埋伏在周边的民兵，手持棍棒蜂拥而上，抡起棍棒一顿狂打。国民党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破了胆，浑身筛糠，腿肚子发软，却不知所措，慌忙之中被打的头破血流，顿时丢枪弃甲，盐也没找到，却挨了一顿毒打，垂头丧气溜回房山城。从此不敢轻易行动，更不敢冒然来佛子庄，威震敌胆的姜振政，勇斗国民党查盐士兵，在神龙福地佛子庄广为流传。

姜振政组织群众，在这场反查盐斗争，取得胜利，即震慑了敌人，又长了村民的士气。

1928年秋，姜振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通州师范学校，那时属于民国，时局动荡，许多人为谋求利益居心叵测，难免目光浑浊阴暗，使得民不聊生。而姜振政在校读书时，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风云变幻之中，宦海沉浮的年代，姜振政去寻找救国的道路。

通州师范毕业后，做为一名教书匠，教书育人是他的本职。先后在怀柔和顺义任教，在教学的过程中，接触新思想，灌输



新的理念，并团结进步学生，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姜振政认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等理念，少年时就给灌输革命理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因此，姜振政在房山简师任教时，组织进步学生成立群众型“文化研究会”，宣传进步思想，畅谈马列主义，追求革命真理，向反动势力做斗争。做为教师，姜振政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培养学生，由于业务精通，在民国时期，被任命为房山县教育科长。

姜振政虽然做了民国的官员，他寻求真理目标坚定，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也曾受到国民党房山党部歧视，后来又因揭发国民党房山县长，因贪污教育经费一事，被国民党房山县，免去教育科长一职，成为一名普通的教书先生，去了房山南窖教书，作为南窖小学的校长。

(二)

七七事变之后，坨里往里河套沟也被日本占领，姜振政此时，正在南窖小学任校长。南窖属于房山县五区管辖，日本侵略者，不但占领了良乡城，同时也占领房山城。以陈东来，胡振海，白秀亭为代表的抗日同盟军，号称三路大军，打着抗日的旗号，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地盘，维护自己的利益。

1938年2月初，驻守在房山县城的日军，让房山县五区，为日军送去50名壮丁和50杆步枪。这件事让五区难办，为此



五区召开窑商会和各村村长商议，决不当亡国奴，也不能给日军送人和枪，但事情还要应付，这些人心里也没有底气，于是去南窖小学找姜振政商量。姜振政即当过政府官员，又是教书的先生，懂得革命道理，又有革命的理想，他便语重心长地说：“面对日本鬼子血腥侵略，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现在唯一的办法，派人去找八路军队伍，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武装”。当时在座的大安山村村长张振武说：“如果去找八路军，我知道八路军在哪里”。于是，姜振政写了一封信，说明当地的情况，也表示南窖人民抗日的决心，交给大安山张振武，让他迅速给八路军送去。

没过了几天，送信的人回来了，还带回了八路军干部包森的回信，姜振政迅速打开回信，便泪流满面。包森的回信中，字字句句饱含深情，虽然只有两页的信纸，却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抗日的决心，阐述了八路军开辟平西根据地的意图。从朴实坦诚的言辞中，姜振政看出包森是个豪爽练达心胸开阔的人，未见其面，却有一种钦佩之情在姜振政心中油然而生。而信的最后还约定见面时间，包森将亲身来南窖开辟敌后根据地。

姜振政把包森来南窖的喜讯，告知那些开明人士，还有进步学生，这些人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姜振政说：“包森来南窖的事，我们要宣传，大张旗鼓地宣传，包森来的那天，我们要组织人夹道欢迎，要打着横幅欢迎。自从那天起，姜振政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等待着包森的到来。



1938年2月底，这天姜振政起床特别早，初春的早晨，天空虽然有些阴沉，不一会儿却飘起了雪花，随着雪花飘落，山间小路被白雪覆盖。雪花还在飘着，欢迎仪式已经准备好，“热烈欢迎八路军干部包森来南窖开辟工作”横幅早已悬挂好。可看这天气，包森能来吗？姜振政肯定得说：“能来，一定能来”。姜振政在学校门前等了一会，天气确实很冷，姜振政便说：“咱们一起走走吧，到前面去接应一下，走走身上也会热起来，说着几个人，便顺着山道向前走。雪花还在飘着，群山已银装素裹，一片洁白，崎岖的山路，弯弯曲曲，走着走着，雪慢慢地停了，一缕阳光拨开云雾，太阳出来啦！那金色的阳光浮在云层上，群山普照阳光。姜振政站在路口，向远处望去，在大房岭崎岖的山路上，有两个人影正向这边走来，一前一后走着，后面那个人挎着盒子枪，俩人满身积雪。姜振政让同行的人原地等待，他便飞快地迎了上去，脚下的积雪全然不顾。见面后，姜振政便说：“你是包森同志吧？”“我是包森”，包森说：“你是姜振政同志”，“我是姜振政”，说着俩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包森回头便说：“这是我的警卫员孙乃谟”，姜振政又跟孙乃谟握手，“早盼望你们来”，乡亲们在等着你们，于是边聊边走，很快来到了南窖小学。

学校里欢迎的人群中，有各村村长，社会名流，进步人士，还有学生们，列队欢迎包森同志，这位来自八路军的干部。包森那一身农民打扮，非常年轻，豪爽练达，是一位心胸开阔的人。他是从涞水县板城村，爬过一条大梁，虽然有些疲惫，见到乡



亲们，反而神采飞扬，谈笑风生。他站在小学校的讲台上，滔滔不绝，讲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全国老百姓，迅速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运动战。包森的讲话，语重心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姜振政听了万分激动，百感交集。当时提出辞去教书的差事，从此参加革命，打鬼子保家乡，捍卫红色政权。姜振政向包森表示自己要求参加革命的心愿。于是，在包森的介绍，经邓华政委批准，姜振政参加革命，并在 1938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先锋战士。

(三)

1938 年 3 月，仍是寒凝大地，雪卧冰封时，而南窖那面火红的抗日旗帜，在南窖上空高高飘扬。南窖小校成为抗日的热点，有爱国人士，进步学生。这些人中，有佛子庄姜振政，还有长操的王友吾，而姜振政的心像火一样燃烧，做起抗日工作，既然忘了吃饭之事。

首先，在南窖成立了房涿涿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做为房山县第一个抗日政府，也是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在区政府成立后，王友吾任区长，建立抗日武装，改编了南窖五区自卫团，成立房涿涿联合县抗日游击支队，包森任支队长，姜振政任政治部主任。为了扩大抗日武装，组织又派姜振政，去张坊一带，做白秀亭的收编工作，白秀亭土匪出身，无恶不作。抗日战争爆发，白秀亭组织抗日同盟军，虽然有抗日热情，却躲在山沟里，



观风赏月。姜振政去找白秀亭，可见姜振政的智谋和胆略。

初春的一天，姜振政独自一人出发，从南窖翻山越岭，踏破青山，去做同盟军白秀亭的工作。听说白秀亭在张坊，姜振政任县教育科长时，也曾认识白秀亭，却没有过深的交情，这次出行不知事态如何？

姜振政一个农民打扮，翻过大岭后，便沿着山边的小路奔向张坊，正是农闲之时，加上世道不宁，路上的人很少。姜振政青布棉裤棉袄，头戴个破毡帽，也是四处打听，不知实情，看他是个陌生人，都有害怕的感觉。来到张坊城边，打听路旁的人，才知道张坊只有白秀亭一个小队，白秀亭大本营在大峪沟驻防。这时，天已快黑下来了，路上的行人也渐渐的少了，只有姜振政还在寻找白秀亭的营地。

大峪沟村，是一道宽阔而深的沟，沟里乱石滚滚，但景色却不一般，沟深大约十里地，沟的外侧是宽阔的平原，大峪沟具有战略地位，这里既可进攻也可防守，难怪白秀亭把营地设在这里，估计也有高人指点，要不白秀亭不会有这么高的战略布局。

姜振政走到大峪沟口，已经很累了，却被岗哨拦住，“干什么的”？“我是白秀亭的朋友，司令的老熟人”，告知一下。那哨兵听着半信半疑，看他这打扮，不像是司令的朋友，便上下搜了身，也没发现什么，才放姜振政进去了。

“白司令不在，先去司令部休息”，勤务兵说，于是姜振政被安排在司令部等候。这时天色已大黑，在那黑幽幽的山沟



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这时白秀亭回来了，勤务兵报告，司令的一熟人要见你，白秀亭听了一楞，“什么熟人？白秀亭这两天心烦，去饶乐府请马诚之先生，来同盟军当军师，却遭到先生一顿痛骂，“什么同盟军，就是一伙土匪”，让白秀亭心里不爽，心里正在郁闷，来了个熟人，不知何许人也，赶紧请上来”。姜振政走进屋里，一眼就认出白秀亭，可白秀亭感觉有些眼生，止不住地细细端详。姜振政忙说：“秀亭？我是姜振政”！蓦然间，白秀亭想起那个穿长衫戴眼镜的县政府官员模样，可记忆中姜振政不是这样打扮。而面前这个人，却穿着棉袄棉裤，头顶上还戴个破毡帽，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何况这么多年不见，白秀亭一时那能认得出来。

白秀亭先是愕然，紧接着亲热地叫了一声：“姜先生！”白秀亭在长育上学时，姜振政是县政府教育科长，经常来学校视察，布置全县统一考试事项，学生都称他为先生。即使是熟人，热情款待，又摆宴席，又安排住处，把姜振政安排下来。白秀亭见姜先生一来，心中一喜，马先生既然不来，把姜先生留下，便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深夜里，姜振政翻来复去睡不着，他心里有事，找白秀亭谈归顺之事，而白秀亭竟然让姜振政留下，当他的军师，姜振政有些不爽。早晨起来，姜振政问白秀亭在吗？有人告诉他，说白司令出去了。姜振政心里着急，吃过早饭后，也没什么事，便看看二路军的情况，一是看看人数，二看武器装备，三看兵力布署情况，从中了解一下白秀亭真正的实力。



姜振政被困在白秀亭那有一周呀，他敏锐地感到，已经被白秀亭扣留了，身边有个田副官，可对于这个田副官身份不清，姜振政一点都不了解。田副官送茶时，姜振政便问他，“白秀亭在哪儿”，“我要见他”，田副官只是说：“司令不在”。姜振政说：“你把壶放下，咱俩聊聊天，田副官只是无奈地点了点头，“那好吧”。”田副官是房山城关人，家有父母妻儿，姜振政问他怎么当同盟军的？这一问，勾起田副官的心酸史。田副官埋在心里的仇恨说了出来，对日本侵略者刻骨仇恨，因为他的父亲，在二站天主教堂，被日本鬼杀害。日本兵炮轰房山城那天，他一家人幸亏逃得快，不然都被炸死。姜振政给他讲国家的形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全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么一讲，让田副官心中豁然开朗，他连连点头，眼睛瞬间也亮了起来。

姜振政让田副官把外面人叫进来，给他们讲：岳飞抗金的故事，山沟里静的很，漆黑的夜晚，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恰似山野间闪烁不定的萤火。姜振政这么一讲，让哨兵们各个摩拳擦掌，有人便讲，“老在这山沟里呆着干啥，不如跟小鬼子拼上一把，像岳家军那样，死也痛快！”

第二天，又有一群哨兵，在姜振政门前，准备听故事，却被田副官赶走，田副官急忙进屋，然后插好门栓。姜振政问：“怎么回事，你要干什么？”田副官示意不要出声，对姜振政说：“姜先生，今晚你必须跟我走！”我跟你去哪儿？你要跟我讲清楚。姜振政有些惊讶，田副官忙说：“不要细问了，白秀亭这两天



要对你下手”。

田副官有些着急，“姜先生，您这人大仁大义，可白秀亭那是土匪，他心毒手狠，跟您明说吧，日本人威胁白秀亭，即然不能投靠日本，也不能投靠八路军，不然把二路军全部灭了。日本人讲：“你这个人很危险，必须除掉”，白秀亭不敢，日本人用 100 支枪，做为条件，要换您的人头。白秀亭答应了日本人，这两天就要动手，姜先生，您今晚必须走，把后窗户撬开，从这里走，田副官留下一个撬棍。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姜振政把后面一扇窗户撬开，田副官和姜振政迅速跳出窗外，猫腰顺着院墙钻进了灌木林，正要翻过东大梁，忽然听到后面有人追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嘈唠的人声越来越近，有人压低嗓子喊：“田副官，姜先生”！原来是听姜振政讲故事的那群哨兵，大约有十几个，他们追上来，想跟姜振政去也要参加八路军。姜振政果断地说：“你们暂时不能去，要留下来做工作，二路军有一千多人，让他们共同抗日”，姜振政耐心解释：“我这次来，目的是改编二路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抗日队伍，如果你们跟我姜振政走了，就会让白秀亭感觉八路军拆他的台。你们留下来，宣传八路军抗战主张，改变二路军土匪作风，走一致抗日的道路，打败日本侵略者，让民众获得自由，国家得到解放。

姜振政这次张坊之行，虽然没有如愿以偿却在同盟军中留下火种，事后必有成果，为下次收编打下基础。就这样，姜振政和田副官连夜寻山路，奔上大防岭，这时月亮高照，正赶上



十五，月光洒下群山。

(四)

姜振政为根据地的建设，日夜奔波，做了很大的贡献，这时组织上决定，派姜振政和包森一起随挺进军开辟冀东根据地。在行军的路上，遇到日军围剿，在延庆东边，与日军进行激战，姜振政表现非常勇敢。来到冀东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武装，成立密平蓟联合县政府，姜振政任县长，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建立平谷县政府，姜振政是平谷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宣传抗日主张，动员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对平谷县自卫团进行改造，成立冀东平谷抗日游击队。对平谷县旧警察局，进行了改编成立抗日民主县保卫队，负责县政府机关保卫工作。

姜振政担任平谷抗日政府县长时，日军从西部进攻平谷，他亲自指挥游击队，在岳各庄村阻击日军。姜振政胆大心细，指挥有方，在疯狂的日军面前，他机智勇敢，取得阻击战的胜利，给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冀东建立平密抗日联合县，姜振政仍然担任县长，同样执行共产党抗日政策，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为根据地创建日夜奔波。后来由于冀东情况复杂，受组织派遣姜振政又转入北平城内，做党的地下工作，主要为根据地筹集款项，购买药品和枪支，收集情报，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历尽艰辛万苦。



在北平城内，有许多地下党员，都是隐蔽战线的英雄，为抗战做极大的贡献，姜振政也不例外，他在北平城内开店做为掩护，收集情报，购买枪支，还有解放区急需的物资。这天平西地下交通员乔连瑞，来北平城里取枪，根据上级指示，把姜振政接回平西。乔连瑞要去西城，这是暗指姜振政的居住地，姜振政做为专署敌工科长，潜伏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有两年多了。

姜振政的布店，在西四北大街，门前挂着招牌“茂源布店，”专营布匹生意，店内有带印花的土布，也有色泽艳丽的洋布。姜振政也改名叫“时志”，两个站柜台的小伙子，都是地下工作者，实际是我党秘密交通员。地下党祖良和儿子祖忠被捕后，交通员见情况紧急，问是否挪地方？而姜振政分析情况，认为“茂源”眼下没有暴露，何况搬这里没几天，搬家没有必要，也就没有动，姜振政派人出去打探祖家父子消息。

刚过午响，乔连瑞和吴玉清俩人，坐着三轮车来到布店外，他俩看看周围的情况，一切照旧，没有什么异常现象，俩人进了布店。姜振政把他俩让进里屋，屋里砖夹道放着二十支新步枪，乔瑞连看了喜出望外，爱不择手。姜振政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二十支步枪运到根据地，现在要想办法运出北平城，拖延一天，就增加一分暴露的危险。乔连瑞此次行动，第一是取枪，第二是护送姜振政回平西。平西专署指示，北平敌工科工作交给别人，调姜振政回平西，仍然任平西敌工科长一职。

事情也真凑巧，姜振政与乔连瑞商量如何把步枪运出北平



城，想来谋去无计可施，门外出现蹊跷的事情，姜振政有计可施了。那天有一位少妇到街上买胭脂，遇到两个日本兵，少妇吓得往回跑，两个日本兵紧追不放，眼看就要追上了。这时从一个门楼里走出一位老人，见光天化日调戏妇女，老人拦下两名日本兵，一顿训斥。日本兵见理亏，也不敢再追逐，便退出了胡同，这时另一个日本兵，回头一枪，正好打在老人的前胸，老人便栽倒在门前。老人临咽气说了一句，“高绍绅你这个混帐的东西”！

老人的大儿子叫高绍绅，在日本人那里当翻译官，高家也属于大户人家。看到这种情况，姜振政自信地说：“这回有办法啦”，死人需要棺材，要不去买棺材？要不去做棺材？何况高家是大户人家，棺材不会忒的，而且要“三五”尺寸以上。姜振政精心布置，派小伙计送上一个白信封，里面装着一沓钞票，上面写着“茂源布店时志”的字样，出殡那天，高绍绅已和日本宪兵队打好招呼。姜振政也身穿重孝，夹在送葬的队伍中，他身上的孝袍又宽又大，那把精致的勃朗宁手枪，就藏在袍袖中。而乔连瑞在另一边，一但出现不测，乔连瑞首先将敌人引开，二十支步枪，就藏在棺材的夹层中间，隐藏的非常严密，轻易暴露不了。

本来可顺利通过西直门，可这时意外却出现了，突然来了俩个日本宪兵，不知是哪路神仙？日本兵非要检查，大家一起哄，吹鼓手声音悦耳，慌乱之下，准备出城。可日本宪兵突然鸣枪，这枪声一响，慌乱中人们顿时镇定下来。姜振政感到



事情不妙，便急中生智，有冲出城外的想法。于是，他冲赶车人说了一句，“把式，快躲开，马惊了”！

车把式顿时明白了，大声呼道：“大家快躲开，马惊了！”此刻，车把式用棍子往马的裆一杵，辕马被这突然一杵，顿时受了惊吓，马前蹄一扬，拖着大车奋力狂奔。日本宪兵也怕出危险，赶紧闪到一边，那些出城的商贩也趁着混乱，随机跑出了城外。守城的日本兵和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破了胆，纷纷躲了起来，等他们清醒过来，马车早已跑出很远。姜振政和齐连瑞也随马车冲出了城门，跟着马车直奔解放区。让高绍绅这个日本翻译官，也莫名其妙，清醒过来，感觉上了当，马车早已行驶在奔平西根据地的路上，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姜振政回到平西根据地，仍然担任专署敌工科长，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筹集善款，购买抗日急需物资。

在北平城内，佛子庄燕张庭曾在复兴门开杂货铺，生意很兴隆，店铺临街面，人来人往，此处是姜振政建立的地下交通站，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急用物品，大部分由燕张庭夫妇俩购买筹集。在情况紧急时，姜振政和同事曾化妆日本宪兵，去北平燕张庭铺取钱，然后购买药品和枪支，还有纸张和油墨等。通过地下交通站，想尽各种办法，运往平西根据地。燕张庭夫妇俩，曾为根据地做出很大贡献，也曾被人误会，却遭其非议。姜振政曾出生入死，在北平城东奔西走，为八路军寻找物资，购买军火，不同的场合儿，扮演不同的角色，出现在北平城内，目的是为了完成任务。



(五)

房良联合县政府在长操村，而五区的抗日政府，也搬到了长操村。长操这个地方，有战略优势，整个村子被群山环抱，山上灌木丛生，山下河水环绕，跟南窖相比，这里的回旋余地相当大。姜振政感到家乡的美丽，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熟悉。

1938年底，姜振政任平西敌工科科长，专做同盟军的工作，姜振政仍然深入同盟军首领胡振海，白秀亭所部，做抗日宣传工作。他的工作细致贴心，道理讲的清楚易懂，使俩人愿意接受八路军改编。胡振海部被改编为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白秀亭部改编为抗日游击二支队，姜振政被任命为这两个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后来敌特务分子破坏挑拨，俩人的思想出现波动，姜振政临危不惧，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两部做思想工作。在白秀亭部深入官兵之中，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姜振政在官兵中，有极高的威信和影响力，使游击支队得到迅猛发展。1939年被编入挺进军，姜振政又在邓华支队任敌工科科长，他经常深入敌人内部，宣传八路军政策，瓦解敌人，收编地方武装，扩大抗日力量。

为了筹集善款，姜振政四处奔波，在南窖窑商会，各村富裕商户，本着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抗日原则。有一天，姜振政神秘地来到了河套沟李各庄村，拜见开明人士苏禹民老先生，



老人家心地善良，早在清朝末期，为造福人民，四处筹资，修建大石河防水墙，让人民避免水患，从而安居乐业。

老人家素以佛子庄村有亲戚相称，那也是孩子的姥姥家，这次姜振政光临此院，必有事相求。姜振政讲了共产党抗日的主张，还有根据地的建设需要钱和物，老人家听姜先生这一讲，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也恨之入骨，认为当前主要是抗日，便毫不犹豫的为抗日捐款，临行前，姜振政把一张晋察冀报纸，放在了老人床前。

初冬的夜晚，天气有些冷了，姜振政顺着河套往回走，刚过角而安，听到后面一阵追杀声。姜振政迅速隐蔽灌木林里，准备看个究竟，前面的人在飞跑，后面俩人紧追不放，前面的人看来手脚利落，隐蔽在石头的后面，等待追上的人。那人刚一露头，隐藏在石头后面那个人，便飞身一脚，将追上的人一脚踢倒，后面的人上前一搂，那人一个背跨，将后面那人摔得贼死。姜振政看那熟悉的动作，便知道是敌工科乔连瑞所为，看来他昨天进城买药，今晚已经回来了，在路过河南炮楼时，被两个伪军盯上了，于是出现了刚才那一幕。俩人再次相会，也是缘分吧，都是平西敌工科的人，姜振政今天去筹的是钱，而乔连瑞却进城，购买紧缺药品，俩人又一次见面，感到很亲切吗！搭伴回到了长操。

1940年春节过后，在大石河边，有一位骑毛驴的女青年，说是回佛子庄姥姥家。此人就是李各庄开明老人苏禹民的大女儿苏世珍，她来佛子庄村名义去姥姥家，实际是参加了八路军。



这位进步青年，在姜振政的引导下，也是在父亲的教诲之中，寻找到革命队伍，入伍参加了八路军

姜振政看到苏世珍参加八路军，心情特别高兴，苏世珍在八路军敌工部搞地下工作，代号“时珍”。紧接着苏老爷子，又把自己的二女儿，送到长操参加八路军，长子苏世伦也参加八路军。苏老爷子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看来姜振政到苏家大院，工作成绩显著，可以说人财双丰收。

在姜振政的宣传中，还有那晋察冀日报，让苏老爷子对抗日有了认识，他不满国民党统治，深知共产党，能够把黑暗的中国，引到光明的道路，这让姜振政非常敬佩。苏老爷子却是位开明人士，感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阳光必然普照中国大地，让旧中国从黑暗中走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姜振政不懈的努力，苏家大院这位开明人士苏禹民，不但送子当兵，还积极捐钱捐物，支援平西抗日斗争。在接触中，苏老爷子非常敬佩姜振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姜振政和苏世珍走到一起，苏老爷子非常高兴，在平西抗日战场，据然有一对抗战夫妻。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家口解放，姜振政任张家口市秘书长，察哈尔省财经委秘书长，工业厅长。可战后的工业一片狼藉，百废待兴，经济萧条有待恢复。为了恢复生产，经济运行发展，



在生产管理上，实行计划、组织、监督、落实的方针，让工业生产起死回生，逐渐恢复正常，创造出效益。

新中国成立后，姜振政投入国家地质事业中，任北京地质局局长，党委书记，他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如山。临行前，有关领导特意找他谈话，诚心诚意对他讲：“这次回京工作，把内弟苏世伦带回北京吧”？姜振政只是一笑了之，然后又说：“张北人民更需要他”，于是便轻装回京履任。

姜振政在北京地质局工作，仍然保持革命本色，坚持政治上合格，业务上过硬。在工作中努力学习，坚持每天写工作日记，他常对人说：“人既要吃饭，也要学习，不吃饭，肚子会饿，不学习脑子会空，大情小意都不知，怎么能干好工作”。姜振政在学习过程中，始终持之以恒，写心得笔记，居然有十几本学习笔记，都是理论到实际过程中谈体会。姜振政这学习的典范，曾在地质部门广泛宣传，并作为经验而推广。

在地质局工作期间，姜振政患有半身麻木，肌肉有些萎缩，行动有些不便。而地质局离家又远，按姜振政的级别，有专车接送，可他坚持每月付车费，绝不含糊。姜振政每次出差时，从不搞特殊化，不管到哪个部门，制度遵守，从不违反。做为一局之长，掌管财政大权，却勤俭持家，从来不铺张浪费，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高尚情操。

姜振政不徇私情，侄子从部队转业，找他想留在北京工作，被他严厉的批评：“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不能挑三拣四，都想留在北京，外地谁去建设”，侄子听了不在言语，只好听



从组织分配，去了河北省石家庄，在那里踏踏实实工作。姜振政有一个女儿，在老家农村居住，想到部队去当兵，便找到了父亲，让父亲托战友说一声，也被父亲严厉拒绝，让女儿无法理解。可姜振政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与群众同甘共苦，在群众中享很高的声望。女儿自己报名参了军，去了湖南，靠自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姜振政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那是一贯性的，1963年，在全国上下一致，响应党中央的指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姜振政带头检查去江西九江市吃猪肉的事情，这件事情，姜振政本来不愿意吃，当地偏要让请他吃，吃完饭后，姜振政付了五元钱。在广州郊外，人家请了他吃半只鸡，姜振政却负了一只鸡的钱，虽然当时都付了钱，但也要做检讨。为此件事，姜振政曾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受：“九江楼上一席肉，羊城郊外半只鸡，浴罢东海收小礼，工余南京享大席，半推半就风格差，亦步亦趋仿旧习，南京八连真好汉，下楼老姜洗污泥”。姜振政将此诗读给大家听，让在场的人，拍手称赞姜局长淳朴实在，不愧党的好干部。



两次参加国庆观礼的吴春山

白全永*

吴春山（1901—1983），原房山区青龙湖镇岗上村党支部书记，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因成绩显著，曾先后三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七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笔者与吴春山同志是同乡，曾在岗上村工作二十多年。在工作中，老书记吴春山同志的“老黄牛”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扎根基层，建设家乡。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我跑档案馆查阅文献，采访老干部、老党员、老村民记录口碑资料，对吴春山同志的事迹和档案进行了专项收集整理。现将老劳模吴春山同志的先进事迹和两次参加国庆观礼的一些资料整理成专文，以扬先人辉业，而励后人鸿志。

劳动模范吴春山

1901年8月14日，吴春山出生在岗上村的一个雇农家庭。

* 白全永：原房山区岗上村档案员、房山区政协文史撰稿员



解放前，他曾给财主家打短工、扛长活将近 40 年之久，受尽欺压。

吴春山小的时候家境极为贫寒，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无奈之下，为了活命家中先后把吴春山的妹妹送给了别人家当童养媳，把他幼小的弟弟也过继到了外村。八、九岁的吴春山便开始给财主家做活，放牧牛羊、打短工累计 10 余年，受尽欺凌。吴春山长大成家后，继续给财主家扛长活达 28 年之久。但不管他怎样没日没夜的苦干，家境却没什么好转，自己的六个孩子也因饥饿和疾病先后夭折了五个，只剩下一个女儿。受生活所迫，吴春山曾只身前往塞外跑过买卖，贩卖牲畜，以此来维持生计。面对旧社会的贫穷落后和满眼刀兵，饱尝战乱和压迫之苦的吴春山就表达了：“人民何时安居乐业？中国何时出能人？国家何时富强统一？”的强烈愿望。1945 年 8 月，共产党房、良县政府开辟了坨里以外的新解放区，在岗上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吴春山终于看到了曙光，他积极拥护“双减斗争”，并担任了本村的农会委员。1948 年底，房山、良乡两县相继解放，吴春山终于迎来了新生，他从心底里感激恩人毛主席，感谢救星共产党。1949 年春，吴春山积极参加良乡县委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当选为岗上村的农会主任。分到了自己土地的吴春山心情振奋干劲十足，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同年 7 月，由于吴春山工作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岗上村属于丘陵地区，原本是个“十年九旱不打粮”的穷



地方。这里土地瘠薄，遍地砂石，缺水少肥，粮食亩产只有几十斤。旧社会，这里是有名的“穷三多”，即扛长活的多、逃荒要饭的多、光棍汉多。为了改变家乡旧貌，使乡亲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解放初期，吴春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在岗上村成立了全县的第一个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吴春山下决心要带领乡亲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互助合作，促进生产。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人微力薄，缺少耕畜，没有资金，甚至有的群众连吃粮都成问题。面对诸多困难，吴春山给大家鼓干劲儿，带头参加劳动。没有耕畜他们就赤膊人力拉犁耕田，天气干旱他们就挑水点种，千方百计战胜困难。一天，吴春山发现老农吴秀唉声叹气，干活打不起一点儿精神。一问才知道，吴秀家断了粮，一家老小已经无米下锅。这可怎么办呀？吴春山一边鼓励吴秀要振作精神，继续搞好生产。一边把自家的粮食借给吴秀，帮他度过了难关。晚上，吴春山考虑到吴秀家应该不是个例，他及时找来其他干部召开会议，研究一下看看都哪些群众家缺粮。为了解决群众的困难，吴春山又想方设法向亲戚家借来了 100 元钱，买了六石粮食，分给各困难户。就这样，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调动起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吴春山带领大家起早贪黑，精心耕作，积极抗旱，用辛勤的汗水换回了好的收成。当年秋后，岗上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粮食亩产 200 多斤，比解放前翻了好几番。其中吴秀家的十六亩地就打了 18 石粮食和 3000 斤红薯、400 斤花生，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一下子，岗上村在地区便出了名，成为了全县的



生产模范村。吴春山还被评选为劳动模范，参加了河北省的首届劳模大会。

岗上村的老干部武凤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还会很激动地说：“解放后的头一年，岗上村就获得了大丰收。秋后，大家那高兴劲儿就不用说啦！老主任吴春山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劳动模范！”

难忘的1952年

岗上村获得了头一个大丰收后，吴春山继续带领社员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利用冬季的农闲时节，吴春山带头在全村展开了积肥竞赛活动，给村中的田地多上肥，改良土壤，增加地力。他还让社员到附近的灰窑去做工，增加副业收入。就这样，岗上村的集体家底从八元钱、六头毛驴起步，逐渐壮大了起来。但是前进的道路，总不会是那么平坦。

1952年春天，岗上村遭遇到了严重的春旱。田地里种下去的27亩谷子都没有出苗，棉花也都被旱死。社员急得直跺脚，也想不出办法来。面对干旱，吴春山在社员大会上跟大家说：“干旱不可怕，就怕人没有志气。老天爷不是不下雨吗，那我们就打井抗旱和老天爷干一仗。就是抛家舍业也要战胜天灾，夺取丰收！”吴春山这样一说，社员们心里也亮堂了，劲头也上来了。吴春山及时组织大伙勒紧裤腰带抗旱打井，铁钎碰在石头上，火星冒起老高。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早起晚



睡，仅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山坡地上打出了三眼砖石井。紧接着，他们又挑水点种，种上了谷子，补齐了棉花。功夫不负苦心人，秋后岗上村又获得了丰收。谷子、棉花、花生都获得了好收成，粮食产量在地区冒了尖儿。电台、报纸都相继报道，介绍了吴春山带领社员战胜旱灾夺取丰产的事迹。这一年，岗上村还获得了国家农业部的高产奖励。也是在这一年的九月中旬，又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到了村里，吴春山收到了毛主席的请柬。当时，吴春山双手接过金色的请柬，上面用醒目的红字写着：

订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七时，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敬请光临！

毛泽东

老党员武国文回忆起这件事，兴奋的说：“我当时还很年轻，见过这张请柬。全村人知道老主任要去首都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高兴得不得了！”老干部武凤也回忆说：“一想要见到毛主席了，吴春山激动的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过去的苦长工，能有今天，做梦也不敢想啊！”1952年9月20日，吴春山到达河北保定。本次河北省赴京观礼的劳模代表共有6人，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召开了赴京参加国庆节观礼代表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吴春山激动地发了言，当时《河北日报》刊登了吴春山的发言内容：“我们村里群众听说我参加国庆观礼，大家高兴的了不得，都叮嘱我好好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保证把毛主席的指示记在心里，等到回来后再告诉大家。现在正是种小



麦的时候，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为庆祝国庆节，今年要保证按照人民政府计划多种小麦，争取超过计划。”9月22日上午10时，吴春山等劳模代表乘车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河北省人民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代表，到车站欢送。

1952年9月30日下午7时，庆祝建国3周年招待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应邀出席的有各国外宾、驻华使节；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战斗英雄；有各民族代表、革命老根据地代表、华侨回国代表、工农业劳动模范和北京市各界代表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的接见了各界代表。当108名劳动模范代表步入会场后，大厅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音乐。毛主席致辞，高举酒杯同大家一起共饮庆功酒。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为岗上村写过一部村史《阳光灿烂照征途》，上面对吴春山参加这次国庆招待会有这样的记述：

载着全国劳模的一辆辆大轿车驶进了中南海，吴春山的心就更激动了。在金碧辉煌的中南海里，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招待会，河北省的代表坐在大厅的最前列。当毛主席走进了宴会厅，大厅顿时爆发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吴春山使劲地拍着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心噗通噗通地直跳，毛主席慈祥可亲，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微笑着，向同志们频频挥手致意。吴春山端详着毛主席泪水不知不觉地模糊了眼睛，他揉了一把，继续看着毛主席……他暗暗地下决心，海枯石烂，跟毛主席干革命的红心永不变！听毛主席的



话,把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1952年10月1日上午,阳光灿烂,风和日丽。吴春山等劳模代表乘专车来到天安门,登上了国庆观礼台。上午十点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庆祝游行活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向群众挥手致意,广场上人山人海,花团锦绣,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长久不息,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本次国庆节的观礼活动结束后,还组织劳动模范们参观了首都的各行业建设情况。新中国成立三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振奋人心。

吴春山见到了毛主席的喜讯传到了村里,男女老少欢呼雀跃。吴春山刚进村,乡亲们就把他团团围住,问这问那,都来分享见到毛主席的幸福喜悦! 1952年,对于岗上村来说,必定是难忘的一年。

1970年二赴国宴

面对成绩,吴春山没有满足他教育社员要继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社,争取更大的成绩。

1955年,已经55岁的吴春山开始担任岗上村党支部书记。他根据本村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使集体经济快速发展。首先,吴春山带领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使全村80%以上的山坡地变成了水浇田。由于生产条件改观,岗上村的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吴春山历来重视畜牧业的发展,



他常说：“牲畜是半个家，耕耩驮拉，代替劳力全靠它，离了它就抓瞎。”起初，集体办猪场没有猪源，他就动员爱人把自己家的两头猪赶到合作社。没有钱买大牲畜，他就将自己参加劳模会获得的 500 元奖金拿出来，为集体买了一头骡子和两匹马。吴春山还亲自搬到集体畜牧场去住，而且一住就是十三年。他们坚持自繁自养，精心培育，牲畜数量逐渐增多，最多时大牲畜存栏达到 220 头。与此同时，吴春山很重视林果业的发展。用他的话说：“村子要想富，必得要栽树，好年头人养树，坏年头树养人。树木里面出珍珠，种树就是开绿色银行。”创业初期，发展林果没有树秧，吴春山就带领社员一面去漫水河河滩拔河柳，一面卖鸡蛋凑钱买树苗。后来通过多年努力，岗上村共栽植林果树木 20 万多棵，全村人均种植材树 230 棵，人均种植果树 140 多棵。昔日“偏坡溜岗”的穷岗上变成了“花果山，米粮川，鸡鸭猪鹅乱叫唤”的富岗上。

文革期间，吴春山曾被打倒，受到摧残，造反派说他是紧跟旧市委的假劳模。当时，吴春山每被批斗一次，他的妻子就在家里的黑墙上刻上一个道印，后来统计竟被批斗了 300 多次。有位作家，还根据这个素材创作了一部万余字的小说《黑墙上的刻痕》。就是在那种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的日子里，吴春山却没有忘记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他仍关心集体的事业，发现问题及时指出。1969 年 6 月，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吴春山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以古稀之年继续担任岗上村党支部书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高龄的吴春山没有止步，在他的努力下



岗上村办起了车床厂、铸造厂、建筑队等基础副业，还利用本村的小水库和池塘进行人工养鱼。岗上村真正实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1970年9月，幸福的时刻再次降临。吴春山又一次接到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订于一九七〇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下午七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请参加！

周恩来

1970年9月30日的晚上，吴春山第二次赴国宴光荣的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再次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毛主席。后来，在一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吴春山提到了自己参加这次国庆招待会的往事。特别是周总理给劳模们敬酒的情景，使他记忆犹新。吴春山是这样说的：“一九七〇年国庆招待会的那个晚上，是我终身难忘的时刻。年迈的周总理，满面笑容地来到我们几个农民席前，亲切地和我们干杯，还满怀深情地问候我的身体。当时，我满肚子话要向敬爱的周总理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热泪簌簌地往下掉……”1970年10月1日上午，吴春山再次登上了国庆观礼台。他亲历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工农兵群众一起，隆重庆祝建国二十一周年的盛景。天安门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万众欢腾。群众的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

这次国庆节观礼活动结束后，许多单位邀请吴春山去做报



告。远郊、近郊的农村，城区的许多机关、部队、学校、厂矿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吴春山用作报告的形式，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对待革命工作，怎样正确对待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鼓励人们要牢记宗旨，胸怀祖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奋斗终身！

一生的荣耀

吴春山两次参加国庆观礼，他视此为平生最大的荣耀。他在工作与生活中一直以此为鞭策，时刻牢记党的宗旨，热爱集体，密切联系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坚持勤俭办社，带领全村群众共同致富。

平日里，吴春山严于律己，办事公道，大公无私，被人们誉为“革命的老黄牛”、“人民的老长工”。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主任！”吴春山在村里时常教育社员，现在过上了好日子，那都是党的政策好。我们要再接再厉搞好生产，为国家多做贡献。他还生动的比喻说：“这叫大河满，小河流。”一次，吴春山到市里开会，发现首都市民吃鲜菜困难。回村后，他就动员群众把30万斤蔬菜全部按平价提供给了首都市民。1970年大秋，正是秋收的农忙时节。房山县葫芦堡公社朱岗子大队的大牲畜因食物中毒突然死亡，来岗上村求援。吴春山问明情况后，及时和干部们商议把本队四挂大车的辕牲口支援给了朱岗子，一时间“风格马”的故事轰动了全县。到1978年，



岗上村的粮食亩产达到了 849 斤，成为了北京市丘陵地区粮食产量最高的村之一，全村人均向国家贡献粮食 432 斤。从 1956 年到 1978 年累计向兄弟社队、国营厂矿提供大牲畜 406 头；木材 5000 多立方米；干鲜水果 400 多万斤。

岗上村的老会计郜文福说：“老主任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的很好！他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把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放在前面，把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老社员吴友说：“吴春山当干部没得挑，叫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做到。他那真是一正、二硬、三有理！”当时在村里，吴春山常对大家说：“勤是聚宝盆，俭是传家宝，搞社会主义建设少不了！一分钱也要掂量着花，我们要一日打柴千日烧，细水长流。”首先吴春山从自身做起，他家的两间小黑屋一住就是 80 多年。办社 20 多年，岗上村不设招待费。生产用的犁、耙、耩、筐、绳子等工具，能自制的就自制，能自修的就自修，绝不额外开支。岗上村在吴春山的倡导下，一直坚持民主理财，大兴勤俭之风。经过多年的自力更生，勤俭办社，全村呈现出了粮食牲畜多，生产收入多，社员储蓄多的“新三多”现象。

几十年如一日，吴春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本色不改。他的一生是勤劳俭朴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生。在他的领导下，岗上村成为了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党和人民也充分肯定了吴春山的业绩。建国初期，他曾连续三次被评为河北省的劳动模范。划归北京市后，他又四次被评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他还多次被选



为省、市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75年，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3月，中共房山县委授予他“农业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吴春山善于思考，他在多年的农业生产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被称为是京郊农业的“土专家”。有关部门还专门总结整理了吴春山的《骡马经》、《养羊法》、《抗旱经验》、《造林经验》和《谈农业气象》、《勤俭办社》等经验，进行推广。

“春蚕到死丝方尽”1983年11月2日上午9点25分，老劳模吴春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其骨灰被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当时《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对吴春山逝世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其中《人民日报》刊登的报道如下：

全国劳动模范吴春山逝世。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全国劳动模范原北京市房山县崇各庄公社岗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春山因病医治无效，于11月2日逝世，终年八十三岁。吴春山的追悼会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彭真、万里、郑天翔等送了花圈。

吴春山1952年在自己家乡带头办起了第一个互助组，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他是农业方面的“土专家”，有关部门曾专门总结过他的“骡马经”、“养羊法”、“造林经验”和勤俭办社的经验。

吴春山是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生前一代楷模，逝后风范长存！吴春山同志逝世后，中共



房山县委做出了向吴春山同志学习的决定。1985年8月，老劳模吴春山纪念碑在岗上村西坡落成并被开辟为“教育基地”。每年当地的党员和各界群众都会在这里集会，共同来缅怀这位革命的老黄牛。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不断前进，传承劳模精神，建设美丽家乡！

相关附件：

（一）、参考资料：

- 1、房山区档案馆：吴春山相关档案资料。
- 2、岗上村老干部、老党员、老村民的口碑资料。
- 3、《阳光灿烂照征途——岗上大队村史》：北京大学历史系岗上村史写作组，1973.11。
- 4、《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北京日报》相关报道。

（二）、资料照片 7 张。



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山



吴春山在田间劳动

吴春山 1952年国庆节参加观礼档案记录

姓名	吴春山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籍贯	华北区河北省阜平县	职业	农业劳动模范	职务		备注	
参加观礼组织	光荣	参加观礼单位	河北省农业厅	观礼地点	北京	观礼日期	1952年10月1日	观礼内容	参加观礼	观礼地点	北京	观礼日期	1952年10月1日
观礼地点	北京	观礼日期	1952年10月1日	观礼内容	参加观礼	观礼地点	北京	观礼日期	1952年10月1日	观礼内容	参加观礼	观礼地点	北京

照片
吴春山在田间劳动

吴春山在田间劳动，今年秋收，他种的玉米产量高，质量好，被评为农业劳动模范。他积极参加观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决心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为农业增产贡献力量。

吴春山 1952年10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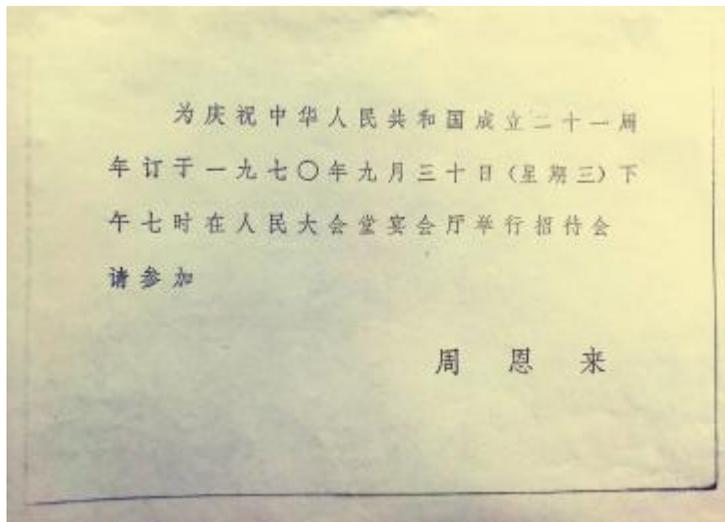
河北省农业厅 1952年10月1日

吴春山 1952年10月1日

1952年吴春山参加国庆观礼的档案资料



1952 年各地劳模来到首都接受嘉奖（队伍第三人为吴春山）



1970 年吴春山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



吴春山和群众们在一起



吴春山纪念碑



我与徐庆文同志的交情

孙奎春*

全国劳模徐庆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35 年了。我与老徐同志的交往虽然不多，然而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年长一点的人来说，徐庆文这个名字，在房山地区乃至全市都比较熟悉，甚至可以说如雷贯耳；但对一些中青年人而言却有点陌生，有必要作简要介绍。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徐庆文就是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徐庆文，1922 年 5 月出生在房山区南韩继村一个贫苦的家庭，16 岁（1938 年）参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先后 7 次负伤，9 次荣立战功，由战士升至副营长、参谋长。1954 年秋天，胸佩军功章的徐庆文，谢绝了部队首长和地方领导的关怀，军政大学的门不进，县里的干部不当，拖着因多次受伤而虚弱的身躯，义无反顾的回到了家乡南韩继村当农民。1955 年，徐庆文被选为高级社主任，之后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79 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当选第三、四、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 孙奎春：原北京窦店砖瓦厂党委书记



在上世纪 60 年代，原房山县委经常召开县、社（乡镇）队（村）三级干部千人大会。我当时在县委工业部工作，被抽调大会资料组搞情况简报，看到徐庆文多次在会上介绍经验，见面后寒暄几句，只能说彼此认识，但从来没有长谈过。

记得 1971 年冬季，当时我在县革委会政治组负责社队党组织建设工作，领导责成我与孟宪洲同志找徐庆文谈话，其目的在于“解放”干部，恢复工作，使之端正认识，轻装上阵。对此，我二人感到有点棘手，认为老徐闻名遐迩，见多识广，怕谈崩了无法收场，并设计了几个方案，一旦出现问题，如何应对。本来应该到南韩继去谈，但为了稳妥起见，将徐庆文同志请到周口店公社政治组来谈。实际谈话情况与事前设想的截然不同，彼此一见如故，他热情豪爽，说话直来直去，极具人格魅力。我们从谈日常生活入手，气氛轻松和谐。

徐庆文同志不愧为受到党的长期教育的老革命，高风亮节，对“文革”中受到的种种冲击避而不谈，并且主动检查自己：“我性情急，批评人不讲分寸，有家长作风。我亲眼看到经过几年“文革”运动，粮食亩产由吨粮下降到七八百斤，心里着急啊！我确实说过“今年喝酒不用买酒瓶子了，玉米棒长得和酒瓶差不多，伤害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同时，他还畅谈了上任之后如何团结干部和社员群众，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把生产搞



上去，继续发扬南韩继的优良传统，使之薪火相传。

我认真倾听了他的谈话，感到由衷地欣慰与鼓舞，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帮助他分析了问题的根源及其危害。着重指出：你一正二硬，大公无私，廉正为民，勤劳致富，有口皆碑。但是，不足之处是要求标准过高，工作方法简单，缺乏以理服人，批评人不顾及后果。据说你老父亲夜间值班出了点纰漏，你都不讲情面，让老人家下不了台。他听了之后连声称是，并表示“以前我总强调自己出发点是好的，考虑后果不够，今后一定注意改正。”这次谈话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从此之后，我与徐庆文同志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二

徐庆文自小没上过几年学，是部队这所大学校把他培养成思维敏捷，敢想敢干，德才兼备的优秀指挥员。1982年春，我在北京窦店砖瓦厂任党委书记期间，为了加强工农联盟教育，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把工作搞上去，特邀请老徐同志给全厂200多名干部和学校教师作报告。他讲话不拿稿件，然而成竹在胸，如数家珍，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有情节、有数据、有生动感人的典型事例，博得了大家的高度评价。

老徐同志回到家乡之后，首先是熟悉村里的情况，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他亲眼看到阔别十几年的南韩继村仍然面貌依旧——全村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有粮田1040亩，亩产178



公斤，是一个在全县挂了号的“缺粮村”。自然状况是：“南沟北港缺水源，东面黑沟西面滩，偏坡溜岗十九沟，十年九旱八不收。”“一年到头地里忙，只够全家半年粮。”乡亲们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心情十分沉重。于是，他暗自下定决心，不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誓不罢休！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并且慷慨解囊，将转业费毫无保留地全部捐献给村里，用于发展生产。

徐庆文 1956 年当选高级社主任，次年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方针，打了平整土地、打井抗旱、广积农家肥、科学管理等几个改天换地的战役，尤其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建设为重中之重。到“文革”前经过 8 年的限苦奋斗，削平 4 座高岗，18 条大沟，平整土地 510 亩。在“旱高台”上打井 107 眼，修地下暗渠 3000 米，实现了“东水西调”；修建水泥构件防渗渠 3000 米，从根本上解决了旱涝保收问题，把旱地改成了水浇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的丰产田，从而结束了十年九旱的历史。

讲到农业科学管理，首当其冲的是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科学种田。南韩继的最大特色是，专群结合，成立了 40 人的常年积肥专业队，人人动手，广积农家肥、有机肥和绿肥，将千亩粮田建成了“大寨式”的海绵田。再加上改革耕作制度，实行小麦、玉米套种，种满种严，管理应时，苗全苗壮，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开创了全国北方第一个“亩产吨粮村”，居京



郊之首，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南韩继人保持着谦虚谨慎，勇于进取的态度。他们的带头人徐庆文曾饱含深情地说：“没有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南韩继就没有今天。”他说：彭真同志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曾先后 4 次亲临南韩继村视察，在我们打井抗旱的关键时刻，指示市有关部门支持村里部分电线杆、电动机，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当他听说南韩继每年向国家交几十万斤优质粮，库里还存几十万斤粮时，彭真同志兴奋地说：“把郊区农业搞上去，全市人民吃饭问题就解决了”。1966 年 4 月，彭真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干部要坚持深入群众，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此同时，徐庆文还讲了一段与彭真同志感人肺腑的往事——在“文革”浩劫期间，彭真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恢复自由之后，约徐庆文去市内相见。由于 9 年牢狱生活的摧残，彭真同志清瘦多了。二人见面后彭真同志说：“叫你来没有什么事，就是想见见你。为了我让你受到牵连，心里不安啊！”徐庆文听了之后非常激动，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话——“彭真同志您可别这么说。”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筑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农村要实行各种责任制，诸如小段包工、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等。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是对农业战线上各



级领导干部的一次严肃考验。这对于处在农业第一线的举旗人徐庆文来说，确实是一个大难题，让他着实费了一番脑劲。他组织支部一班人认真学习文件，看报纸，听广播，冥思苦想，吃不好，睡不着，简直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他认识到：“农村实行责任制是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一场变革，它的精神实质是层层、事事落实责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迅速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坚决落实。但是各地的情况不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盲目搞一刀切也不对。”

摆在徐庆文面前的问题是南韩继何去何从？因此，他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南韩继的情况，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他掷地有声地说：“南韩继当前集体经济牢固，资产雄厚，领导班子强，科学管理水平较高，根据70年代的实践经验，完全可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何必非要分田到户呢？”之后连同实施方案一并上报，得到了市委书记焦若愚同志的肯定，结论是：南韩继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对这一众望所归的结果，全村男女老少都非常高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徐庆文的路子走对了！”

三

以徐庆文为首的支部一班人——大队长孙凤成、副大队长王文忠、妇女队长刘玉淑、民兵连长葛万成，团结战斗，善于学习，勤于思索，有进取精神。他们认识到，随着形势的发展



变化，有必要对治村谋略做适当调整。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农业生产不能将农村经济搞活，让群众过上富足的生活；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提高，节约了大批劳动力，需要妥善转移；集体经济力量雄厚，有资金，有场地，可以因地制宜和市场需求情况，有选择、有计划地搞点工副业项目，因而将治村谋略确定为八个字——“以粮为主，多种经营”。徐庆文身体力行，亲自抓，陆续上了几个工业项目，个个盈利，越办越大，形势喜人。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的素质，树立南韩继的良好形象。重视在实践中选拔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确保南韩继这面大旗高高飘扬，永不褪色。

记得在 1982 年夏季，我接到老徐同志的电话，他说：“近期新办企业正在筹备开业典礼，需要装点一些花卉，上次我去你们厂看到花园里花木很多，能不能借我一些摆一摆，用完以后再给送回去？”我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老兄有远见，有气魄。我这个小花园品种不少，你可派人来挑选，咱哥们之间何必说什么“借”字，就算我为新企业锦上添花吧。他哈哈大笑，一再道谢。这竟然成了我二人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天下午我接到讣告，徐庆文同志于 1984 年 1 月 3 日晨不幸逝世，1 月 8 日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厅向遗体告别。噩耗突然传来，犹如五雷轰顶，深为痛惜。同时，我信手写下 32 字，为他辉煌的人生历程表示赞赏。



一正二硬 大公无私
忠心报国 全心为民
清正廉洁 办事公道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月8日上午，我作为生前友好来到八宝山告别一厅，徐庆文同志的告别仪式规模大，规格高，壮严肃穆。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同志、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送了花圈，市、县有关部门和周口店公社、南韩继村等都送了花圈。参加遗体告别的有北京市历届主要领导同志段君毅、焦若愚、贾庭三、王宪及广大群众五六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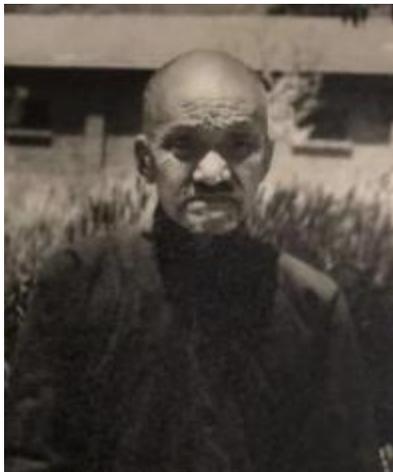
徐庆文同志虽死犹生，他的精神依然鼓舞着南韩继人勇于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忆平西抗日模范村老书记——刘显彬

赵志清*

1897年的某一天，在大山深处十渡马安村一个男婴诞生了，这是一个贫苦的大家庭，他已经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了，全家就靠着少有的一点点山地和山中的桃、杏、柿子、核桃、黑枣等山果艰难的生活着，就像四周的大山世代代顽强地默默地生存，这就是旧中国传统的农民。



刘显彬就在这个最普通、最平常的山村里像其他家的孩子一样皮皮实实在在地成长。到了上学的年龄，他渴望着学习，想读书认字，想做有出息的人。好在姐姐、哥哥们已渐渐长大，能帮助家里做劳务，为父母分担重负，他如愿以偿地进入村中的私塾，一念就是十年，学到了很多東西。

经过了十年的读书生涯，刘显彬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 赵志清：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助理房屋租赁管理所所长



再出去深造家里已不具备那样的经济条件，家中和乡亲们都认为他已经是有文化的人了，就应该开始为家里做点事了，就应该帮助养家了。

在这个山村里别无选择，他也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像村中每一个家庭一样，跟随长辈们下地干农活。人慢慢的长大，听人们讲的故事越来越多，经历的事也越来越多，那些不平事、不讲理的事也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他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熟。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快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广大的中国军民义愤填膺，奋勇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之中。

战争的烽火同样烧到了平西，革命活动在大山深处也轰轰烈烈的展开。党的组织也进入到深山发展工作。一天，共产党员刘德香找到刘显彬说：“显彬你看日本鬼子已侵占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家门口了，他们想占领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做亡国奴，我们能干吗？你有文化，懂事理，我想让你也参加革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你愿意吗？”刘显彬点了点头说：“我愿意！”从此，刘显彬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们开始走家串户，联络进步、正直的村民，成立组织，组建民兵。当时由身体健壮、聪明灵活的刘占广任民兵连长，在村里少林会学过艺的青年也参加了进来，革命的活动便开展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刘德香看到刘显彬工作积极认真，进步很



快，找到他说：“显彬，我看你表现很好，你入党吧！”在刘显彬眼里党员都是很上进，很有能力的人，他说：“只要组织看着我够格，行！太好了！我早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刘德香高兴的说：“好！我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要做到保守党的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你的家人和媳妇！”自此，刘显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更加积极了，他带领着村里的青年们开展敌对斗争，支援前线，同民兵一起到山外背军粮，扒铁路，抬担架送伤员，动员青年参军，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每一项工作都很艰巨，不久，刘显彬就被任命为马安村党支部书记。

就拿背粮来讲，确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当时八路军九团驻扎在马安，一个团的给养就靠山区几个村有限的土地产的粮食是远远不够的。一天中午，田团长到村支部来找刘显彬说：“老刘啊！部队现在缺少粮食，山外地下党的同志已经筹集到了一部分，但是需要你组织民兵尽快从张坊把粮食运回来。张坊以外是敌占区，路上要穿过敌人封锁线，我知道路上是很危险的，我也会派战士保护这次运粮行动，你看有什么困难吗？”听完田团长的话后他说：“危险就不用说了，只要是革命工作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会尽快组织民兵把粮食运回来！”当天下午，一支由八路军战士和民兵组成 30 多人的运粮队伍就出发了。马安村距张坊 40 多华里，没有公路，只能徒步沿拒马河河滩走，天黑前必须赶到。30 多人静悄悄行进，路上谁也不能打听去哪背粮，这是纪律。走了 4 个多小时，队伍按时到达，稍作休息，



就跟着平原地下党的同志前往藏粮地点背粮。由于粮食分散隐藏在各家各户中，按事先规定，分散入户背粮，然后村口集合。

集合完毕已经是后半夜了，队伍往回走的速度明显慢多了，每个人都背着很重的粮食，战士背负的更多，他们除了背负粮食还要携带武器弹药。任务重大，环境危险，刘显彬心里很不安，边走边想：千万不要碰见敌人，如果和敌人交上火，可就麻烦了，粮食就运不回去了。想到这里他对大家说：“大家走路要轻要快，这里是敌占区，我们要尽快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切行动要听从队伍上的同志指挥！”部队的同志对大家说：“同志们，老刘同志说的很对，现在行动听我指挥，我说跑大家就最快速度跑，我说卧倒大家就卧倒。”说完队伍又继续前进，没过多久就到了封锁线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忽然敌人的炮楼上有伪军喊话，领队的同志赶紧回答道：“老总啊！我们是赶集的！”敌人又吼道：“半夜赶哪门子集啊？我看你们是八路！”领队又说：“老总冤枉啊，我们是山里的老百姓，今年山里的粮食绝收了，大人孩子没的吃了，到集上来买点粮食，天黑了我们在亲戚家吃了点饭歇了歇脚就晚了！”在和敌人周旋的时候他们就慢慢的往路边的庄稼地里移动，哪料到由于刚刚浇过地，一走进地里两脚立刻就陷进了泥里。也许是伪军大半夜的也不想多事了，就说：“以后再从这走白天走，如果晚上皇军在你们一个都走不了，全都得抓起来！”敌人放行了，我们赶紧从泥里拔脚赶路，谁知大部分同志的布鞋都陷在了泥里，天又黑，身上背着百十斤的粮食还要光着脚赶路，没多久脚就疼



的受不了了。把粮食安全运回是重要任务，不能耽搁。可是光着脚走河滩路也不是办法呀！这时有鞋的人提议说：“鞋大家轮换着穿，也许会好点儿。”可是，即便是这样，走了一段路还是不行，大家的脚还是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刘显彬很是着急，这样也不是长法呀，对大家说：“没鞋的同志把上衣袖子扯下来把脚裹上，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大家照就作罢，走了走，脚疼确实好了一点，大家就又坚持着走。天大亮了他们才艰难的赶回马安，大家把裹在脚上的布打开，脚底全都磨破了，有的布已经粘在脚上了，一步一个红脚印，他们都感觉不出疼来了。他们光荣的完成了任务，心里总算踏实下来了，虽然很累但很高兴，子弟兵有粮食吃了，吃饱了肚子才能狠狠的打击侵略者，他们认为受点苦，受点累，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这样的支前任务他参加过很多次，不但他积极参加，还让十四五岁的儿子刘德川跟着参加。他们有的只是奉献，没有想要得到什么。有几次他们袭击敌人的装备库，缴获了大量的日军食品、装备，虽然他们是农民出身，吃不饱，穿不暖，但他们从来没有动过私心，将缴获的战利品全部交公。他不仅仅自己这样做，也要求、影响儿子这样做，他的儿子由于严格遵守纪律，不怕苦、不怕累，也向他一样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

日伪军为了控制、打击军民抗日，在平西山区一制高点王老铺村西建起了据点。因为他们知道马安有共产党的队伍，而且是一个堡垒村，怎么都渗透不进去，日伪军恨透了马安村。于是，敌人从王老铺翻山越岭到马安村东山康儿站一个土匪家



建立了据点来侦查、监视、控制马安。他们时常从山上往下扔手榴弹、打冷枪，骚扰村民，使百姓不得安宁。部队、区县政府以及坚壁的粮食弹药和隐藏的伤病员遭到威胁。1940年9月10日，经县政府和八路军团首长讨论和研究，制定了一个拔除东山康儿站据点的作战方案。具体方案如



村长刘德忠

下：先由马安村党支部派出民兵去摸清据点的详细情况，然后再由部队派人消灭敌人。刘显彬作为马安村支部书记在会议上表示由他亲自带领民兵执行任务，事不宜迟，当晚行动。这天傍晚，他带领村长刘德忠、民兵连长刘占广及刘德旺等十几个民兵就从百岭安偷偷摸了上去。大约晚上10点左右到达了敌人的据点，这个据点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人家，一个三合院，没有院门。经过简单部署，刘显彬和刘德忠先进院子敲北屋门，民兵们伺机行动。敲门后屋里有个老太太答话，此人是土匪头子的母亲，问：“谁呀？”外边答道：“我俩是附近村子的，去王老铺回来天太黑了，想借住一晚，天亮了就走。”老太太说：“行，你们等着我给你们开门啊！”门开了屋里黑漆漆的，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突然冲出屋门就要跑，刘显彬猛地跑上去一把抱住了那个人，两人将其按倒在地，这时民兵们听见动静就知道有情况了，立即冲进来，三下五除二就把人绑住了。等



点亮煤油灯后一看正是要抓的土匪头目。然后，民兵准备搜查东西屋，东屋搜查后没发现情况，但是西屋门打不开，非常可疑。这时，刘显彬突然发现西屋窗户伸出一只枪管，赶紧喊“快躲开！”接着几个人跑到西屋木门前，一脚把门踹开，进屋后非常奇怪，并没有人，抬头往房梁上一看，上边趴着两个人，这两个人知道发现他们了，就说：“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自己下来！”

经过审问得知：西屋里的两个伪军是保护土匪头和负责站岗放哨的，经过搜查缴获了两杆长枪和 50 颗手榴弹，一共俘虏 3 人，老太太（土匪母亲）不予追究。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伤亡，没用八路军出击，他们就成功拔掉了敌人据点，粉碎了日伪军的阴谋。

他们押着俘虏和缴获枪支弹药物资回到村子后，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八路军九团首长的高度赞扬。被俘敌人经过人民政府审判后，除土匪头子被枪毙，两个伪军由于也是被敌人抓来的壮丁，也是穷苦老百姓出身，没有做过太多坏事，经教育后就释放了。

1941 年秋，日寇开展了疯狂大扫荡，实施“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8 月 24 日，日伪军沿着拒马河谷向山里进犯，经过西庄、平峪、紫石口到蓬头一路烧杀，但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力，日军回到西庄、王老铺据点。8 月 28 日，西庄据点派汉奸给各村送信，要各村给据点送钱、送粮、送民夫。他们让马安出夫 50 名，马安一个也没给，第二天又要 100 名，马安



还是不给，鬼子说了第三天要 150 名，如果还不给就把马安村杀光、烧光、抢光。鬼子穷凶极恶，跟马安较上劲了，事态严重。支



部书记刘显彬、村长刘德忠连夜组织班子成员到村西塔沟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办，究竟给不给鬼子出夫，给吧，违背心愿，帮鬼子干事，不给吧，全村面临着灾难，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拿不定主意该咋办。村里的鸡都叫了，还没拿定主意，真是束手无策，心急如焚，天快亮了，还没定下来。刘显彬看了看大家说：“几位都不说话就是不想给敌人出夫，让我说呢这就对了，咱们不给敌人出夫，决不投降，决不当顺民，与敌人斗争到底！这样吧：咱们回去动员乡亲们，坚壁清野，疏散人员，投亲靠友，烧了咱们房子咱们再盖！”于是，分派任务，分别行动。

第三天，鬼子气势汹汹的闯进了村，进村后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共烧毁房屋 478 间，河路沟损失最大，全村只剩小砣后一家几间房屋躲过一劫。马安村在抗日时期被鬼子烧过三次，但马安村民非常坚强，没被鬼子吓到，反而增强对日本帝国主义仇恨，继续和鬼子战斗。刘显彬事后感慨地说：“马安人民个个是好样的，我们村没有一个叛变投敌的，全村人都够



党员条件，都听党的指挥，跟着党干事！”1941年秋天，房涿涿联合县政府在十渡西庄村口龙王庙（现平西烈士陵园处）召开授奖大会，县长王天瑞亲手将绣着“抗日模范村”的锦旗授予马安村。



刘显彬经常对家人、对孩子们讲：“咱们马安村的‘抗日模范村’的光荣称号跟咱们村的老少爷们是分不开的，只要革命需要，要人出人，要力出力，要粮出粮，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敌人建炮楼、向村里征夫，我们坚决不去，还跟他们对着干，让他们没有立足之地，敌人烧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可以重建，我们没有被敌人吓倒，反而增强了我们的斗志，我们目标只有一个，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打击敌人，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1941年的秋天的反扫荡期间，革命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刘显彬作为村支部书记，要做的工作很多。这日，区县党委领导带着两部分人找到他说：“这是（县）政府和区公所各位同志，这些同志都来自祖国各地，对山区不熟，你要负责隐蔽，被敌人捞了去你有责任！”他点头答应说：“是！”一天早上，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按照区县领导要求县政府同志的吃食自带，区公所二十多人的吃食由刘显彬想办法解决，然后他带领着各位同志隐蔽深山。敌人扫荡三天后，我们的同志安然无恙，圆满的完成了隐蔽的任务。区长王 xx 非常感谢对刘显彬说：“同



志这次隐蔽谢谢你了！我们该转移了，你很忙，又要照顾村子又要照顾家，还要挂念着我们！”刘显彬说：“你们说哪去了，咱们都是自家人！”王区长又说：“我们不离（开）二区，你有事可用信联系。”领导和同志们便与刘显彬他们分了手。

就在那天晚饭后，天刚蒙蒙黑，门突然被推开，一个戴眼镜的20左右的年轻人满头大汗的冲了进来，焦急地说：“老刘！咱县委赵同志被叛徒出卖了，已转移到东山，现在病重高烧，你赶紧派担架抬下来吧，被敌人追上就坏了！”进来的是赵然书记的秘书王玉忠（赵然，1939年5月任房良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1940年5月，杨流萤来房良担任县委书记，赵然任房良县委副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县参议会议长；1941年5月，房良与涞涿合并，建房涞涿联合县，赵然任县委副书记；1942年12月赵然接任中共房涞涿联合县县委书记），他和刘显彬很熟悉。东山很险要，有一段根本就没有路，直上直下的，有点自然沟沟缝缝，当地人称之为“石梯儿”，下了“石梯儿”也都是羊肠小道，崎岖不平，路窄石多，人多了也走不开。刘显彬说：“立陡的高山怎么能抬？”王秘书着急地说：“不能抬呀？你说怎么办！”刘显彬沉思一下说：“我去背他吧！”王秘书瞪大眼睛说：“行吗？”“成！看不能抬可怎着？我先上山，把赵同志背下‘石梯儿’，你先吃点饭，吃完饭你去村里找刘德树，让他带民兵到山下来接应我。”说完转身连走带跑趁着夜色悄悄的摸上了山，等爬上陡崖“石梯儿”后，就一边摸索前进，一边轻声喊（夜深人静，担心敌人听见，暴露目标。）



“赵同志！赵同志！”快要到他跟前时，他猛地站起来对着刘显彬喊：“站住！”刘显彬也下了一跳，他就站住了，再走赵然就该开枪打了。“我是马安刘显彬！”他赶紧自报姓名。“扑通”一声，赵然躺倒地上了。刘显彬赶紧走进他身边，拉过他的手说：“赵同志，你感到怎么不好？”他有气无力地说：“口渴、浑身发烧，担架呢？你们几个人？”刘显彬回答道：“就我一个人。”他唉了一声说：“你一个人怎么办？”“我背你下去！”刘显彬答道。他没指望叹了一口气：“唉！一个人背哪能行？”“试试看！”刘显彬说。赵然书记当时 23 岁，个子很高，背着他爬下石梯难度很大。但情况紧急，他也容不得多想了，简单收拾了一下赵然同志的随身物品，扶起赵然背到肩上，走了不远就该下梯子了，他把赵然放下说：“赵同志，咱们要下梯子了，你要当心，用力抓住我的衣肩，我的两手不能照顾到你，我要扒住石凳才能下去，你千万不要撒手，我愿意咱同志，生同生，死同死，你要撒去两手，我不但没功，还要给你偿命的，我的话你可记住了！”赵然说：“我记下了。”刘显彬又背起赵然开始从石梯上往下爬，每迈一步都是举步维艰，精神高度紧张，又要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把赵然背下“石梯儿”，他喘着粗气，又稍稍的歇了歇，又一直把赵然背到村北，刘德树带着民兵和担架也到了，他把赵书记放在了担架上，坐在一边休息，他的衣服全都被汗水湿透了，像是跳水里那样。担架队抬着赵然同志要走了，这时赵然说：“刘同志呢？”他走到担架跟前，赵然拉着他的手说：“你今夜太辛苦了！我要



求你还要辛苦些，送我到东泉水去吧（房涑涿联合县政府转移到了这里），由你送我很放心。”他当时没做声，他实在是太累了，背着赵书记已经摸黑走了很远的山路，体力已经不支了。王秘书接过话来说：“老刘，县委要求你送去吧！”刘德树在旁边答话了：“叔，你夜里胆小怕敌人捞了去，不要紧，我舍命陪君子，我和你作伴，我俩安全的送到东泉水。”刘显彬想到县领导这样信任自己，一咬牙站了起来说：“好吧！”他带领队伍抬着赵然同志趁着夜色就出发了。一路夜行跋涉，安全的把赵然送到东泉水，等他回到家时，鸡都已经叫了，天也快亮了，整整忙活了一夜，圆满完成任务。

刘显彬经常对子孙们讲：他背赵然这件事是他一生革命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因为赵然同志是房、涑、涿三个县的县委书记，是大领导。为革命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抗战胜利结束！

1947年，按照上级指示，马安村开始搞“土改”运动，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让马安的人民“耕者有其田”。村里还成立了贫农团。紧接着按照上边的精神，又搞起了“搬石头，掺沙子”运动，贫农团主席李祥荣给刘显彬提了60条意见，他就成了那块“石头”被搬了。刘显彬被关进了班房，家里也受到了管制，他在里边受到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打击，但他始终对党没有失去信心。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看守说“你回家吧！”



这时走过来一个人，他也不认识，指着他说：“你叫刘显彬？”“是”他低声达到，“你呀！你呀！没给马安干一点好事，回去好好想吧！”这个人好像是个下乡干部，刘显彬都没理他，扭头回家了。在他被“搬”的同时，村支部班子其他几个人也都靠边站了。回到家里，一家人委屈得哭成一团。



刘显彬与老伴合影

刘显彬劝家人说：“你们不要哭，我是中国共产党员，这点不算事儿。”他嘴上说没事，心里真是接受不了那个人说的话，我没给马安干一点好事，我在村里干了这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最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吗？他真的气坏了，嗓子起了一个大血泡，这十年没日没夜的为党干工作，有时连家都不能回，经常连续开会。记得有几次组织上边几个村的干部开会晚了，他把他们带回家吃饭，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喝粥，这些人在屋里喝粥，他的老伴在外边流泪，因为，这些人把粥喝了，家里人就没得吃了，最后只能喝点刷锅水。他没有时间干自家地里的活，儿子十二三岁就给家里去河边担水，一天书没念，大字不识，就是这样的干革命，落个这样下场他实在是窝火。一个多月的折腾已让他身心疲惫，他告诫自己：别多想了，先把病养好了。他找十渡的毛大夫给他治病，毛大夫在当地医术很好，很快他的病就减



轻了，他说毛大夫保住了他一条命。在他家养病期间，村里刘占职经常到他家陪他聊天，他就给刘占职聊过去那些事儿，刘占职也是了解老革命事迹最多的人。

他的病好些了，他实在憋不住，决定去找那个干部，他来到大队，别人告诉他，那个干部走了。那就找贫农团主席，他来到李祥荣家，贫农团主席李祥荣扛着农具正准备下地干活，刘显彬叫住他说：“主席，别走，我和你谈谈心！”李祥荣瞧了瞧刘显彬说：“谈啥？”刘显彬激动地边讲述过去所做的革命工作和别人的无端指责，边质问贫农团主席李祥荣。李祥荣皱着眉头说：“大事都没有的事，小事就更不是事了，你要再说我就没脸面对你啦！我...我就去南边跳湾去！”刘显彬一看李祥荣这样说，一想，别再问了，真把贫农团主席逼得自杀了我可就有罪了，想到这儿刘显彬说：“那好吧，你说我没问题，我不追了，你下地干活去吧！”李祥荣低声说：“我不去了，太阳都快落山了！”刘显彬又想：上边知道搬石头的政策左了，不然自个也出不来呀，继续养病吧！

1948年秋天，上边领导罗亚茹到马安来找刘显彬，村里刘占职把她领到家中，罗亚茹对他说：“老刘，上边决定让你脱产去张坊片上学习培训，然后去当老师，全国解放了要成立学校，让我们下一代都能上学。”刘显彬沉沉地说“不去！就在家种地了，什么工作也不干了。”罗亚茹看到他有情绪，就给他讲当前的政策和国家的形势，对他说：“党知道你们一批干部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击，想不通，搁谁也会这样，可你是



中共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大风大浪，这点打击算得了什么？你要把你的知识拿出来，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有文化，将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靠他们呀！”她这一席话让刘显彬开窍了，毕竟是多年的党员干部，他答应下来。1948年底1949年初，他被安排在马安任教，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当年的工资由小米兑现。后来，村里个别人到学区反映他老文化，他听到耳朵里和六合村的书记齐艳宾聊起了此事，齐艳宾说：“我们六合不怕你老文化，我们村用你！”一年后他就调到了六合村，一干就是八年。1958年在九渡、1959年在前石门、1960年至1961年在卧龙、1961年至1964年在六合村学校十八盘分校，在十渡地区教学16个年头。

1964年冬，十渡学区校长袁士聪来到十八盘分校找到刘显彬说：“老刘，你岁数也不小了，还在教书，确实很辛苦，云居寺出土了很多石经，那都是国宝啊！想找一个看石经的，想让你去，你看怎么样啊？”刘显彬说：“是不是革命工作？是革命工作我就去！”袁校长笑笑说：“那当然是革命工作！还很重要！”“那我去！”刘显彬答应道。袁校长说：“那你就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吧！”这年11月，由儿子刘德川护送父母和大儿子刘占策到云居寺报到，



刘显彬与孙子刘占策合影



时值入冬，只有 11 岁的刘占策仍然跟从，他外边穿着半大的棉袄，都快拖地了。报到第二天，刘显彬就到云居寺边上的水头村办理了党员组织关系，随后，将孙子刘占策送到水头小学读书。老伴是刘显彬的厨师兼后勤、管家，孙子是小跑腿，一家爷三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云居寺文物保护工作。

1956 年云居寺石经开始挖掘，出土的石经是全世界保存最全、最完整的经书，是国宝！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1961 年 3 月 4 日，云居寺塔及房山石经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显彬认为上级把他安排在这么重要的工作岗位上说明对自己很信任，所以他下决心一定要看好、管好、保护好这些国宝。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水要到云居寺外边的河里去肩挑，粮食也很紧张，没有广播，生活封闭、枯燥、艰苦。唯一能了解外面消息的来源就是报纸。

由于缺少工作人员，他就身兼多职，来人是讲解员，无人是“守门员。”有时参观者要去小西天参观，他就成了导游。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很多的红卫兵涌到这里指着石经对刘显彬说：“大爷，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应当将它彻底砸毁，你怎么还看护它呢？”刘显彬耐心的给他们讲：“这可不是封建迷信的东西，石经是咱们文化遗产，是雕刻艺术，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全世界唯一保存最全的经书，别处还真没有！云居寺是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又给红卫兵讲了很多历史和文物的知识，红卫兵们听了说：“大爷，



您给我们上了一堂历史课，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们不砸国宝了。”说完就都走了，石经也躲过了一劫。社会各界人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云居寺的国



宝，来这里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了，他每天都要接待很多的游客。除此之外他还定期巡视云居寺周边的小西天、老虎塔等地的文物安全。有时还会发现出土石经板的地宫附近有村民在挖砖，他就上前劝说：“这砖是文物不能挖，是受国家保护的，破坏文物是犯法的。”村民说：“家里要搭炉子（炉灶），没有砖，也没钱买，没办法。”他就从兜里拿出了五元钱递给村民说：“你拿这钱去买砖吧，以后不要到这里来挖了。”他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自己工资的一部分就这样支出了，但是他觉得值。

1968年8月份的一天下午四点多，当地驻军防化团的陈团长和政委陪同几位领导来到了经板库院内，刘显彬出门迎接。政委对来访人介绍我说：“这位是看管石经的刘显彬同志。”来访人中一位领导热情的走上前来紧紧的握住他的手说：“老同志，我们来这里看看咱们的石经。”当时他一怔就看着这位领导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面，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政委指着这位领导说：“上级领导来这就是要了解石经的保护情况。”这位领导说：“这几年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来就是看看这里的石经保护的怎样。”刘显彬说：



“请领导放心，石经板没有遭到一点破坏，保存完好。”那位领导听了不住的点头，非常高兴的说：“很好！很好！”领导又问：“红卫兵大串联可到这里来过？”刘显彬回答说：“来过，来过好几拨呢！他们来时说这些石经是封资修的东西，应该彻底砸烂。我对他们说这些石经不是封资修黑货，也不是四旧，是咱们国家的重点文物，这里有国务院立的牌子，是毛主席让保护的。你们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你们怎么能破坏国家重点文物呢？红卫兵听了我的解释就走了。听到这些，那位领导爽朗的大笑起来说：“你说的很对，这些石经是国宝，没有遭到破坏我就放心了！”后来那位领导又问我：“老同志是哪里人啊，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答到：“我是本县十渡马安村人。”这时有位同志插嘴说：“马安是房山老解放区！有光荣的革命历史。”领导又问：“你当过兵吗？”他说：“没当过兵，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村里干抗日支前工作，48年又从事了教育工作，64年调到这里工作看管文物。”“老同志，你对革命有贡献，是有功之臣啊！”领导说。他赶紧答到：“那可不敢当，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你一个人在这里保护这些石经，使国宝没有遭到破坏，很了不起，老同志谢谢你啦！”领导肯定道。谈话结束后那位领导再次握住我的手说：“我以后还会再来，希望你保重身体。”众位领导和我一一握手告别。过了几天，政委来到经板库对他说：“老刘啊，你知道前几天来这里了解情况的那位领导是谁吗？他就是咱们敬爱的周总理！”刘显彬这时才恍然大悟，恨自己当时



没把周总理认出来！对政委说：“政委你怎么不早说呀？”政委说：“那可不行，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安全呀！”

月初，他到文物局领工资，王建中局长对他说：“老刘，周总理来云居寺了解石经保护情况时，得知您的生活很艰苦，提议给您涨一级工资。”他接过工资心情非常激动，周总理日理万机，还要亲自到云居寺了解石经的保护情况，就连看管石经老人的生活这等小事也挂在心上，真是我们的好总理！

1975年，78岁的刘显彬老人从云居寺回老家养病。他回顾云居寺这十多年的工作，不但保护好了文物国宝，还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觉得这十多年过的很有意义。

1979年2月5日，刘显彬同志去世。

资料由刘显彬之孙刘占策、重孙刘长生提供